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006_17(1).0003

求經、刊刻與傳承脈絡：漢文律藏在越南—— 以十八世紀名僧性泉往鼎湖山求經為例

Collecting, Printing, and Transmitting Buddhist Scriptures: Chinese Vinaya in Vietnam. A Case Study of the Monk Tinh Tuyen's Trip to Dinghu Mountai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阮蘇蘭

Tô Lan NGUYỄN*

關鍵詞：越南佛教、律藏、性泉禪師、乾安寺、佛經雕版

Keywords: Vietnamese Buddhism, Vinaya, Monk Tinh Tuyền, Càn An Monastery, Buddhist Woodblocks

2019年7月1日收稿，2019年10月14日修訂完成，2019年10月16日通過刊登。

§ 本文得到成功大學李貴民博士，復旦大學潘青皇博士，紅河學院葉少飛副教授及北京外國語大學王嘉副教授的中文潤飾與指教，謹此致謝。本文的部分內容為筆者與漢喃研究院阮廷興碩士合寫之〈十八世紀性泉禪師與漢文律藏在越南的傳入與傳承脈絡〉，曾發表於「使節·海商·僧侶：近世東亞文化意象傳衍過程中的中介人物」國際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8年8月29-31日）。本論文屬國家科學與技術基金項目：“Các hệ hình (paradim) giáo dục ở Việt Nam: Từ truyền thống tới hiện đại 越南教育類型：從傳統到現代”（編號：KHGD/16-20.Đt.037）。

*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下屬漢喃研究院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ino-Nom Studies, 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摘要

一七三五年越南性泉禪師從當時的中國戒律中心廣東省鼎湖山慶雲寺請回佛教經書，約三百部一千卷（每部書名、卷數不詳）。這些經書包含經、律、論經書。其中，戒律部分已超出宗派內部流行的範圍，並成為當時越南整頓佛教戒律的重要因素，至今仍影響著越南佛教教團的內部生活。本論文主要從三個角度來重建性泉禪師帶回越南的戒律書籍：（一）探討一八三五年福田和尚對性泉禪師帶回經書進行編目。（二）考察與分析乾安寺的佛教雕版，該寺是性泉禪師後來擔任住持之地，同時也是當時刻印書籍的中心。（三）對照越南現存的律經，這些經書來源於性泉禪師從中國所帶回原書的手抄本或重印本。這些書目的重建，可以對研究漢文戒律經書在越南的傳入、刻印，流行與傳播等問題提供新的論點，並了解其對於越南佛教史的重要性。

Abstract

In 1735, Vietnamese monk Tính Tuyền bought back about 300 Buddhist books in over 1000 volumes (titles and the number of volumes of each book remain unknown) from the Qingyun Monastery on Dinghu Mountain in Guangzhou Province,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han center. This collection included Sutra, Vinaya, and Abhidharma books. The Vinaya section within the Tính Tuyền's collection not only became a significant material for the reforms of the Buddhist percepts in in the 18th century Vietnam, but also has deeply affected the internal practices of the Vietnamese Buddhist congregation till the present time.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Tính Tuyền's bibliograph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hree following issues: (1) The list by Monk Phúc Điền in 1835, which cataloged the books remaining over from Tính Tuyền's heritage; (2) The Buddhist woodblocks preserved in the Càn An Monastery, where Tính Tuyền served as the abbot and which also was a well-known Buddhist woodblock engraving and printing center in Northern Vietnam at that time; (3) The Buddhist Vinaya books circulated in Vietnam, which probably were hand-copied or reprinted from the books in the Tính Tuyền's collection. Reconstructing the list of the Tính Tuyền's collection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importation, printing, and circulation of the Chinese Vinaya books in Vietnam and to understand its importance to the history of Vietnamese Buddhism in general.

壹、緣起：十八世紀初之前越南律藏之背景

漢傳佛教經典可說是傳播到越南最早的漢文書籍之一。從經典的角度來看，律藏指的是佛教戒律的規定與評論相關的經書術語。這些經書對於僧人修習和僧團的體制扮著重要作用。它們主要流傳與實踐於宗派內部生活，而很少涉及社會。

現今所存的文字文獻與實物文獻，尚未能肯定一部或多部律藏作品出現在十世紀之前的交州地區，但該地的佛教生活背景顯示，戒律已經成為僧團活動的一部分。牟子¹在《理惑論》只描述公元二世紀後半葉交州僧侶是「沙門」。根據《高僧傳》記載，名僧康僧會（?-280）²在交趾出家，並於公元二四七年來到建業。據《禪苑集英》記載，在牟子時期到公元三世紀中葉以及康僧會時期（約公元二世紀末至三世紀中葉）交州已有二十座寶剎，僧人五百位，³可見受戒活動相當普遍。這時期交州流行的《四十二章經》主要是針對出家人，而非在家修行者的經典。公元五世紀交州釋道禪（457-527）在齊國活動、講授戒律，顯示該區域已經培養出精通戒律的禪師，其精通程度甚至比中土還高。⁴然而，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裡，交州僧侶主要被描述成帶有密宗力量。在無言通禪派出現之前，有關戒律的細節都還相當模糊。

公元八二〇年，無言通禪師（759?-826，以下簡稱無言通）⁵從中土到

-
- 1 牟子，字子博，蒼梧郡人（約生於 165-170，卒年未詳）。據《理惑論·序》，189 年漢靈帝駕崩，約 194 年三國之難，他與母親避難交州。他在羸婁（交州首府，亦是漢代三大佛教中心之一）學佛。《理惑論》是中國漢傳佛教最早的作品。
 - 2 祖籍康居，生於交趾的僧人，被稱為越南佛教的第一位禪師。有關康僧會的傳略，參考〔南朝梁〕慧皎：《高僧傳》，卷 1，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24 年），第 50 冊，頁 325。
 - 3 參考不知撰著人：〈通辯禪師傳〉，《禪苑集英》（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1715 年，編號：VHv.1267），葉 24 下。亦可參見 Cuong Tu Nguyen, *Zen in Medieval Vietnam: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ien Uyen Tap An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 4 〔唐〕道宣：〈釋道禪傳〉，《續高僧傳》，卷 21，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小野玄妙（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50 卷（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7 年），頁 240-241。
 - 5 不知撰著人：〈無言通禪師傳〉，《禪苑集英》，葉 19 上-21 下。

交州，在建初寺（今越南北寧省）創立自己的禪派，此禪派傳燈到十三世紀止。在無言通之前，毘尼多流支禪師（?-594）從北天竺到達中國長安和廣州說法、譯經後，公元五八〇年來交州法雲寺並建立毘尼多流支禪派，法雲與眾善兩寺是該流派行法的主要中心。阮郎根據《禪苑集英》認為，雖然得知印度僧人對禪門組織方式有所影響，但無法具體獲知這些寺院的詳細發展狀況。⁶與毘尼多流支相比，無言通禪派的寺院組織受中國佛教影響更深，此可通過無言通修行歷程來間接進行推測。⁷無言通來到交州以前，曾在百丈懷海禪師（779-803）的寺院修習。百丈懷海禪師是禪院生活規制《百丈清規》的作者，因此無言通極有可能在自己的禪院運用該規制，故對十世紀交州佛教的戒律有了正式規制的實踐。

至公元十世紀，越南律藏開始具體出現，這與當時《大藏經》的傳播有關。律藏在與「經藏」和「論藏」構成元代所謂《三藏經》之前，這些戒律經書已被收錄進宋代早期的《大藏經》當中。⁸最早是前黎時期（980-1009），宋朝分別於公元一〇〇五年賜經與黎桓（941-1005）⁹以及約西元一〇〇七至一〇〇九年間賜經與黎龍鋌（968-1009）。¹⁰自一〇一〇年李朝時期《開寶藏》透過大越與宋朝的外交途徑傳至越南起，根據越南史料記載，至一〇三六年，《大藏經》在越南傳播已有二十六年。在這二十六年

6 Nguyễn Lang, *Việt Nam Phật giáo sử luận* (Hà Nội: Nxb. Văn học, năm 2014), tr. 154.

7 Nguyễn Lang, *Việt Nam Phật giáo sử luận*, tr. 176.

8 Lê Quốc Việt, “Giao Châu một nẻo lối thông Tây vực: Thiên phái Trúc Lâm tiếp cận từ góc độ kinh lục,” *Đặc san Suối nguồn*, kỳ 1 và kỳ 2 (năm 2016), tr. 67-98, tr. 120-150.一文把《大藏經》傳播到越南的時間推至十世紀，丁朝刊刻陀羅尼經場。筆者尚未找到證據印證此觀點。因此本文還是以李朝從宋朝帶回的《大藏經》為《大藏經》在越南流傳的起始點。

9 黎崩，武尚清（點校）：〈黎氏世家〉，《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11，頁287。載言：「（黎大行應天十二年，宋景德二年）二年正月，詔上元節日，賜明提錢，令與占城、大食使、觀燈宴飲。是月賜黎桓應《大藏經》，從其請也。」

10 吳士連等（編），吳德壽、黃文樓（編譯），潘輝黎（校訂）：〈黎紀·臥朝皇帝〉，《大越史記全書》（河內：文學出版社，2017年），卷1，頁28下。載言：「（應天十四年，宋景德四年，1007）春，遣弟明昶，掌書記黃成雅獻白犀于宋，乞《大藏經》文。」；頁29上。載言：「（景瑞二年，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春，明昶自宋還，得《大藏經》文」。黎崩於《安南志略》記載同，而無指出該經是《大藏經》，見氏著：《安南志略》，卷11，頁290。載言：「（宋景德）四年七月，權安南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留後黎龍廷，遣弟黎明昶與掌書記黃成雅貢，龍廷表乞九經及佛經一藏從之。」

間，《大藏經》至少有三個傳本留存於鎮福藏、八角經藏和重興經藏¹¹等國家藏經處。其中一次稱為《大藏經》（1010年），¹²其他兩次則稱為《三藏經》（1018、1020和1034年）。¹³此外，朝廷還曾三次頒令詔寫（即抄寫）從宋朝帶回來的《大藏經》（1023、1027和1036年），藏於大興藏（二種）和重興藏（一種）。¹⁴李朝不斷對《大藏經》「更新」、重抄及收藏，可見當時佛教經典傳播和使用已遍及全國。¹⁵另一方面，對於李朝寺觀不斷建設及增加，史臣黎文休（1230-1322）歎云：

李太祖即帝位，甫及二年，宗廟未建，社稷未立，先於天德府創立八寺，又重修諸路寺觀，而度京師千餘人為僧，則土木財力之費，不可勝言也。¹⁶

-
- 11 參阮蘇蘭：〈越南封建時代國立圖書館略考〉，阮黃燕（譯），收入王三慶，陳益源（編）：《東亞漢文學與民族文化論叢（二）》（臺北：樂學書局，2011年），頁245-264。Phạm Lê Huy, Phạm Văn Triệu, “Dấu tích kiến trúc Bát giác thời Lý tại hoàng thành Thăng Long: tư liệu và nghiên cứu,” *Tạp chí Khảo cổ học*, số 6 (năm 2019), tr. 47-71.
- 12 黎崱：〈李氏世家〉，《安南志略》，卷12，頁294。載言：「十二月，公蘊遣使賀祀汾陰後土，又表乞《大藏經》及御劄八體書法，從之。仍頒《大藏經》、太宗御書一百軸，降詔書獎諭。」
- 13 吳士連等（編）：〈李紀·太祖皇帝〉，《大越史記全書》，卷2，頁8下。載言：「（李太祖順天九年，宋天禧二年，1018）夏六月，遣員外郎阮道清、范鶴如宋，乞三藏經。」、「（李太祖順天十一年，天禧四年，1020）阮道清使回，得《三藏經》，詔僧統費智往廣州迎之。」
- 14 吳士連等（編）：〈李紀·太祖皇帝〉，《大越史記全書》，卷2，頁9下。載言：「（李太祖順天十四年，宋天聖元年，1023）秋九月，詔寫《三藏經》留於大興藏；」葉10下。載言：「（李太祖順天十八年，天聖五年，1027）詔寫《三藏經》」；頁24上。載言：「（李太宗通瑞三年，宋景祐三年，1036）二月，詔寫大藏經留于重興藏」。
- 15 Nguyễn Lang, *Việt Nam Phật giáo sử luận*, tr. 203. 據該書「僧尼、寺院與經典」條統計：「當時京師共有五種《大藏經》讓僧尼及修佛者研究」。筆者對以上觀點進一步討論。在《大越史記全書》所記載鎮福、八覺、大興、崇興等四處藏經書的地點，惟鎮福一定在昇龍城，八覺、大興位置尚未清楚，崇興屬於北寧仙遊山崇光寺。因此很難確定當時京師已經有五種版本《大藏經》。根據史料記載，筆者推測阮郎根據《大越史記全書》天符睿武七年（1126）的「三月，設慶賀五經禮于壽聖寺。」內容來提出該觀點。但難以斷定此五部經是五部《大藏經》。難以置信，李朝每次抄錄《大藏經》都有記錄，而有五部《大藏經》都收藏在一個地方卻無記錄。阮郎在該章節提到李朝兩次遣使向宋朝求《大藏經》：「1081年，帝命梁用律於宋求《大藏經》。1098年阮文信北使時，也求另一部《大藏經》」。不知來源出自哪部史料，茲列出以供討論。
- 16 吳士連等（編）：〈李紀〉，《大越史記全書》，卷2，頁3下。

地方寺廟也許需要重抄朝廷《大藏經》來進行收藏，如《禪苑集英》就曾提到寶鑒禪師在保福寺抄寫藏經一事。¹⁷然而，這些珍貴文獻因戰火連綿，李朝傳來之經書，至陳朝時已全部亡佚。黎崱在《安南志略》一書中引《安南陳求大藏經》云：「唐宋在時，曾馱來於白馬；大兵至日，已化作於死灰」，所以「念此小邦，闕於大藏。若不請求於上國，何以開導於群生。」¹⁸

律藏在越南的傳播歷史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乃是律藏作為《大藏經》系統的文本，其版本乃是十三世紀陳朝於陳英宗三年（1295）「帝遣內員外郎陳克用、范討偕行收得大藏經部回留天長府，副本刊行」¹⁹及次年「元貞（丙申）二年遣貢上表，求封王爵，不允；乞《大藏經》，賜之。」²⁰《大藏經》兩次被從元朝帶回並正式在越南傳播，可見《律藏》對十三至十四世紀大越佛教產生了一定程度影響，原因有三：其一，在《大藏經》傳播到越南的歷史過程中，首次於一二九五年以「副本刊行」，²¹文本形式從手抄本（李朝）到刻本（陳朝）是一種突破，它有助於律藏大規模的流通與傳播。值得注意的是，賜送《大藏經》刻本、抄本²²給大寺院——尤其是當時新建的寺廟，此係陳朝佛教文化的特點。從陳朝人人出家、處處建寺廟的背景，或張漢超（?-1354）於《浴翠山靈濟塔記》²³講述竹林禪派

17 不知撰著人：〈寶鑒禪師傳〉，《禪苑集英》，卷上，葉 24 下。載言：「年三十去官，投多雲保福寺主，落髮其寺。藏經皆手親寫。」

18 黎崱：《安南志略》，卷 6，頁 148。

19 吳士連等（編）：〈李紀·英宗皇帝〉，《大越史記全書》，卷 2，頁 3 下。

20 黎崱：《安南志略》，卷 13，頁 315。該事件在《大越史記全書》無記載。

21 黎崱：《安南志略》，卷 13，頁 315。此外，陳朝還有兩次刻印《大藏經》，記載於性廣：〈第二祖年譜實錄〉，《三祖實錄》（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A.2048），第一次於 1311 年：「興隆十九年，封詔續刊《大藏經》板。師命寶刹主其事」（葉 21 上）。第二次於 1319 年：「（大慶六年己未）師（法螺禪師，竹林第二祖）募僧俗者，刺血印《大藏》千餘卷，置瓊林院。」（葉 24 上）。

22 性廣：〈第二祖實錄年譜〉，《三祖實錄》，葉 19 上。載言：「（興隆十六年，1308）（調御）又以經史外書百函，及所刺血寫《大藏》小夾二十函付師，以廣內外學。」葉 22 下。載言：「（大慶元年，1314）（陳）英宗賜《大藏經》五百函，以為其寺常住（超類）。」葉 24。載言：「（大慶六年，1319）英宗親刺玉血寫《大藏》小夾二十函賜師（法螺禪師）。」

23 張漢超：《浴翠山靈濟塔記》（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片，編號：No.30256），碑文立於越南寧平省浴翠山、拓本藏在漢喃研究院，碑文載言：「余謂：釋迦老子以三空證道，滅後末時，少奉佛教，盡或眾生，天下五分，僧殺居其一，廢滅彝倫，虛費財寶；魚魚而遊，蚩蚩而從，其不為妖魅姦軌者幾希！彼其所謂惡惡可。」

二祖「師鑄佛像大小凡一千三百餘尊，漆布二部，泥塑百餘尊，建大剎二所，塔五座，立僧二百餘所，各度僧尼一萬五千餘人。」²⁴的活動來看，可見律藏作為《大藏經》的一部分，它的數量及流傳範圍是前代所不可比擬的。其二，律藏在越南最早記錄於《三祖實錄·第二祖年譜實錄》：「看《四分律刪補抄》板，印施凡五千餘卷」。²⁵此記載可證明《四分律刪補抄》本於十四世紀已出現在越南，並大量刊刻成印本流傳。²⁶其三，從教授律藏內容活動可以想像，律藏的範圍和規模對當時佛教實踐的影響：「命游僊國師宗鏡、武寧山國師抱璞，就超類寺講之（即《四分律刪補抄》）」，²⁷或間接通過建設戒壇以度僧眾，²⁸或為上層階級受戒，如皇族和官吏。²⁹律藏的影響也可以在陳朝佛教經典中看到，如以陳太宗（1218-1277）的《課虛錄》為代表。³⁰該書除了講解五戒，還有專門討論受戒部分，注重受與持戒律。

隨著竹林禪派衰落，越南律藏的輝煌時代在陳朝末年逐漸消亡。自西元十四世紀中葉，佛教有力的支持者——陳朝貴族階層在政治和經濟逐漸失去勢力。隨著中央集權制度的瓦解，出身於儒學科舉的官僚地主階級開始興起，該階級打破了當時儒—佛思想的平衡。同時，僧團深陷惡習，成為社會弊端。³¹僧侶與寺院不斷增加，但出家人修習的質量和程度卻與之呈反比。尤其是越南與占城戰爭時，寺院成為士兵躲避之地。據阮才書的說

24 性廣：〈第二祖年譜實錄〉，《三祖實錄》，葉 29 下-30 上。

25 性廣：〈第二祖年譜實錄〉，《三祖實錄》，葉 26 上。

26 阮氏錦：〈越南北傳佛教戒律的傳承與當代弘揚概述〉，《世界宗教文化》，第 6 期（2015 年 12 月），頁 119-123。該文認為直到十八世紀越南才出現有關戒律的經書。

27 性廣：〈第二祖年譜實錄〉，《三祖實錄》，葉 26 上。

28 性廣：〈第一祖實錄〉，《三祖實錄》，葉 3 上。載言：「甲辰二十二年，周行聚落，化除淫祠，教行十善〔……〕王公百官，備禮迎駕。王公百官，同受戒法。」葉 14 下載言：「立戒壇三所：大內真教寺一也、超類報恩寺二也、天長普明寺三也。」

性廣：〈第二祖年譜實錄〉，《三祖實錄》，葉 22。載言：「九月，奉詔就諒江永嚴寺，定天下僧職，及置伽藍凡百餘所〔……〕是時度十餘人。後凡三年一度僧，皆減千數。」

29 性廣：〈第二祖年譜實錄〉，《三祖實錄》，葉 24 下-25 上。載言：「大慶八年（1321）辛酉，上品懷寧侯鑄千手大悲一像，及求受菩提心戒。」

30 參考陳太宗：《課虛錄》（北圻：北圻佛教會，1943 年）。

31 參考張漢超：《開嚴寺碑記》（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片，編號：No.23637-23638）、《浴翠山靈濟塔記》；黎括的〈北江沛村紹福寺碑記〉，可見吳士連等（編）：〈陳紀·藝宗皇帝〉，《大越史記全書》，卷 7，頁 36 上。

法，在一三九六年胡季犛（1336-？）下令遣散僧徒、迫使四十歲以下的僧人還俗時，佛教才受到致命的打擊。³²但從文獻的角度來看，越南佛教經籍和律藏經書的最「終點」可能發生得更晚，即屬明時期（1407-1427）。因為越南李、陳時期的佛教文獻（碑銘、金屬、木頭等）流傳到後黎時期（1428-1789）相當稀少並有殘缺。不僅在全國範圍內越南人所撰、刊刻、流通的佛教經典沒有留下痕跡，甚至多次「進口」、重抄、重刻、收藏在各個寺院的《大藏經》也同樣蹤跡難尋。在此背景之下，律藏經典也無法流傳下來。史學家將這種情況的原因，歸咎於明朝對越南文獻所實行的政策。儘管關於該政策的性質、程度、規模和後果有許多相互矛盾的討論，³³但無論明朝是否銷毀全部越南文獻，還是將所有文獻運回金陵，其最終結果無疑都是相同的。或許，中國漢文佛教經典《大藏經》經過在越南的重抄、重刻、重印過程後，也被歸於越南經書，以及由越南人所編撰、刊行的佛教著作內。而當時在大越普遍流傳的是，一四一七年之後自明朝傳播至越南的中國漢文佛教經典。³⁴可惜的是，目前沒有足夠的資料來確定這些經典當中是否有律藏存在。

黎朝初期（1428-1527）被認為是儒教鼎盛的時期，其與科舉制度及集權官僚行政系統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此一時代，正史中僅記錄了些許與佛教有關事情，³⁵主要是求雨、求嗣、神像開光等密宗性的實踐，以及僧侶考

32 Nguyễn Tài Thư (chủ biên), *Lịch sử Phật giáo Việt Nam*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1991), tr. 285. 實際上，很難確定這是胡季犛的政策削弱僧人千年（即范師溫）叛亂之後佛教的勢力，還是陳順宗的觀點以防止佛教的濫用。

33 參考何仟年：〈越南傳入古籍略考〉，《文獻》，第2期（2003年4月），頁257-261。和阮惠之的爭論文章：Nguyễn Huệ Chi, “Cuộc kháng chiến trường kỳ chống xâm lược Minh và văn học yêu nước thế kỷ XV cùng những bước nổi tiếp về sau,” Ủy ban Khoa học xã hội (chủ biên), *Văn học Việt Nam trên những chặng đường chống phong kiến Trung Quốc xâm lược*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1981), tr. 195-261. Hồ Bạch Thảo, “Thử lý giải tại sao những sử liệu thời Minh do Giáo sư Nguyễn Huệ Chi trưng lên từ *Việt kiều thư* khác với *Minh thực lục*,” *Tạp chí Văn hoá Nghệ An* (ấn bản điện tử, đăng tải ngày 28 tháng 9 năm 2013). Nguyễn Huệ Chi, “Sách *Việt kiều thư* trong con mắt giới sử học đương đại (Nhân những bản thảo của ông Hồ Bạch Thảo cũng nhân tin sắp thành lập Viện Không Tử ở Việt Nam),”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và Phát triển*, số 9 (năm 2013), tr. 85-99.

34 潘清簡等（編）：《欽定越史通鑑綱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年），卷13，頁3下-4上。載言：「平定王二年，明永樂十七年（1417）春二月〔……〕又命僧傳佛經於僧道司。」

35 參考 Trần Văn Giáp, “Le bouddhisme en Annam, des origines au XIII^e sièc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32 (1932), pp. 191-268. 在該文章的附錄，作者已

核、嚴禁僧人與宮裡的人通姦、新建寺廟不可以樂捐等朝廷政策。這與李陳時期完全相反，李陳時期朝廷大事均與佛教有著不同程度的關聯性。反觀黎朝初期，沒有任何一位皇帝公開並熱情地推崇佛教，皇家成員如光淑皇太后誠心拜佛，或黎憲宗（1717-1786）時期一個宮人出家也只被視為個人行為，不若從前潮流。³⁶王公與官吏若沒有抨擊佛教，亦不會對此表現特別關心。在黎朝初期的著作當中，對於佛教和佛教思想相關內容的記載都相當淡漠，甚至帶有消極含義。³⁷陳朝末年衰退的竹林禪派發展到了黎朝初期，因為受到徹底銷毀陳朝遺跡的主張，使得該禪派更加脆弱不堪。在往後幾百年間，並沒有出現任何有名望的禪師。許多學者認為，除了黎朝初期獨尊儒家，使得佛教被認為是邪教，被排斥與嚴格控制之外，反而有研究論著認為，佛教雖在國家政治失去原本地位，但對人民群眾的心靈生活，以及對部分儒士官僚仍發揮重要影響。然而，根據黎朝初期佛教碑記資料，從平民階級的視角來看，佛教在社會中的地位仍然很低。³⁸在這樣的背景下，幾乎沒有任何有關當時律藏傳播的史料記載，是可以理解的。

從莫朝（1527-1592）起，得力於國家「三教並存」的主張，大越佛教開始出現復甦信號。寺院同時供奉三教是莫朝宗教特徵，其中最著名的是高陽寺（今越南太平省，1578 年建）和三教寺（今越南河西，1590 年重修）。此外，一些佛教寺廟同時也有道觀的作用（河內青威縣約禮村寺是建設在會靈仙道觀的基礎上）或道教諸神的雕像，例如玉皇上帝、南曹北斗等等。在人民和大施主捐助人力物力之下，全國各地的寺廟得到修繕、

統計黎初佛教的事件。參考 Trần Mạnh Quang, “Ứng xử của chính quyền phong kiến Việt Nam thế kỷ XV đối với các tôn giáo, tín ngưỡng qua tìm hiểu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số 9 (năm 2011), tr. 24-31. Phạm Thị Chuyền, “Một số quy định đối với Phật giáo qua chính sử dưới triều Lê sơ,”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số 4 (năm 2015), tr. 34-45.

36 見阮保、阮沖懿：《坤元至德之碑》（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片，編號：No.01919），和立在洞午寺的碑記（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片，編號：No.11518）。參考 Phạm Thị Chuyền, “Sử liệu Phật giáo thời Lê sơ qua tư liệu bi ký,”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số 2 (năm 2016), tr. 44-45.

37 參考 Phạm Thị Chuyền, “Một số vấn đề về Phật giáo thời Lê sơ (1428-1527) qua nghiên cứu tư liệu văn chương,”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số 7 (năm 2018), tr. 31-51.

38 參考 Phạm Thị Thuý Vinh, “Một số đặc điểm về nội dung và hình thức của văn bia Lê sơ,” *Tạp chí Hán Nôm*, số 3 (năm 2008), tr. 38-48. Phạm Thị Chuyền, “Sử liệu Phật giáo thời Lê sơ qua tư liệu bi ký,”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số 2, tr. 34-62. Đinh Khắc Thuân, “Văn bia Phật giáo thời Lê sơ,” *Thông báo khoa học số 2 năm 2017* (Hà Nội: Bảo tàng Lịch sử Quốc gia, năm 2017), tr. 71-82.

擴大或新建，而最集中是昇龍（今越南河內市）和陽京（莫朝首府，今越南海防省）。在莫朝所建造、修繕的一六八座寺廟中，約有八十座寺廟是皇族、官僚、儒士參與捐助。莫朝歷任皇帝也信奉佛教，莫宣宗（?-1561）於一五五七年賞賜錢財給靈感寺（今越南北寧省），莫茂洽（1560-1592）於一五八二年向華新寺（今越南海防省）捐二十兩白銀。³⁹佛教思想內容與儒道、道教也具體表現在當時名士的著作當中，如阮秉謙（1491-1585）即是一例。⁴⁰可見，僅在六十六年間（1527-1592），佛教已恢復往日活力，並為後來復興奠定了基礎。可惜的是，史料只記載祭拜場所和祭拜活動等相關資訊，僧人戒律修行活動與相關著作幾乎沒有記錄。因此，尚未發現相關史料，以瞭解此一時期越南律藏的流通情形。

莫朝在一五九二年末被黎鄭軍隊擊敗後，結束其在越南歷史上的主導地位。大越歷史進入新的時期，史稱黎中興朝，此朝代延續到一七八九年。這段時期越南歷史雖然面臨內戰不斷的動盪，如中央政權「兩頭制」⁴¹與佔據高平、太原的莫朝和南方阮主的分立（自1677年始）等政權衝突；但因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交流等條件，使佛教得以進入中興時代，⁴²包括北河和南河。儘管與佛教相關的事件並不為正史所記載，⁴³但通過銘文（碑記、鐘記）則可窺見，這兩個地區的皇家與貴族都積極大規模建造、新建各地的寺院，許多皇族和官吏成員均受菩薩戒。阮主阮福澗（1675-1725）被認為是曹洞宗的第三十代傳人，法名興龍。黎鄭家族很多成員皆出家學佛，如黎太后鄭氏玉竹（妙圓）、公主黎氏玉緣（妙慧）都在寧福寺（俗名筆塔寺）出家。該階段越南與中國之間的雙向佛教交流，可以說

39 Đinh Khắc Thuân, *Góp phần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triều Mạc ở Việt Nam*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2012), tr. 173-174.

40 阮秉謙：《白雲庵詩集》（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A.2256）、《三教像銘碑》（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片，編號：No.4662）等。

41 「兩頭制」是黎金銀博士論文之語。參考 Lê Kim Ngân, *Lưỡng đầu chế tại Việt Nam thời Lê Trung hưng (1599-1796)* (Học viện Quốc gia Hành chính Sài Gòn, năm 1969). 該術語指的是黎鄭雙頭體制並行，此後被廣泛用來研究黎中興時期的問題。

42 參譚志詞：〈17、18世紀越南佛教復興的背景及特點〉，《閩南佛學》，第6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204-221。

43 《大越史記續編》記載從1676-1789年越南歷史，其中只記載9條關於佛教事件，而這些記錄並不屬於國家規模。見范公著等撰：《大越史記續編》（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A.1415；歷史院藏本，編號：HV.119）。

是佛教復興的另一個關鍵點。中國僧人如福建人拙拙禪師（1590-1644，以下簡稱拙拙）⁴⁴、廣東人元韶（1648-1728）⁴⁵、江西人石濂（1633-1704）等僧人因多種原因，他們由不同路線來到越南，並在越南建立曹洞宗、臨濟宗等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這也是竹林禪派得以復興的主因之一。

本地僧人如水月禪師（1637-1704），或是在大越修行的外國僧人如明行在在禪師（1596-1659，中國江西省建昌府人，以下簡稱明行在在），都曾到佛教中心——中國求學或求經帶回越南。⁴⁶在國內，南河與北河僧人互相流動，如香海禪師（1628-1715），⁴⁷或只在一方各地流動，如本地宗派蓮宗（北河）或了觀宗（南河）的成立，是以繼承與結合竹林禪派和及他宗派為基礎，因此，寺廟數量與僧人數量不斷增長。歐洲傳教士 Adrian di St. Thecla 神父（1667-1765）在南河生活有約莫三十年，他指出此地每個村社都有自己的寺廟，大的村社則有數個寺廟。⁴⁸戒壇在南北兩地不斷建立以剃度僧眾，這也是許多重要的越南佛教文獻被收集和重刊的時期，例如《禪宗本行》、《三祖實錄》等文獻。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初佛教於各方面的復興，完全可以想見到這時期越南律藏同樣也有了復興的契機。

44 見明行在在（慧進）：《祖師出世實錄》（北寧：佛跡山萬福寺藏本，約 20 世紀刊刻）。Nguyễn Quang Khai và Thích Nguyễn Đạt (dịch thuật và giới thiệu), *Chuyết Chuyết tổ sư ngữ lục* (Thanh Hoá: Nxb. Thanh Hoá, năm 2017). Phạm Văn Tuấn, “Mấy vấn đề gắn với quê hương Chuyết Chuyết tổ sư,” *Thông báo Hán Nôm học năm 2011* (Hà Nội: Nxb. Thế giới, năm 2012), tr. 951-958. Phạm Văn Tuấn, “Khảo về Chuyết Chuyết thiền sư (1509-1644),” *Đặc san Suối nguồn*, số 3-4 (năm 2013), tr. 62-73.

45 參考 Charles J. Wheeler, “1683: an offshore perspective on Vietnamese Zen,” in Eric Tagliacozzo, Helen F. Siu, Peter C. Perdue (eds.), *Asia Inside Out: Changing Tim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35-162.

46 參考譚志詞：《越南閩籍僑僧拙拙和尚與十七、十八世紀中越佛教交流》（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譚志詞：〈十七、十八世紀嶺南與越南的佛教交流〉，《世界宗教研究》，第 3 期（2007 年 9 月），頁 42-52。

47 參如月：《香海禪師語錄》（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1747 年，編號：VHv.2379）。Sa môn Thích Không Hạnh và Cư sỹ Chân Thanh Lê Quốc Việt, “Truyền bản *Hương Hải thiền sư ngữ lục*-bản Sùng Khánh,” <https://thuvienhuequang.vn/blogs/bai-viet/truyen-ban-huong-hai-thien-su-ngu-luc-ban-sung-khanh>, 檢索日期：2019 年 6 月 15 日。

48 Adriano di St. Thecla, *Opusculum de Sectis Apud Sinenses et Tunkinenses* (《中國教派在北河研究》)，英文版則見 Olga Dror, Mariya Berezovska, *A Small Treatises on the Sects among the Chinese and the Tonkinese: A Study of Religion in China and North Vietna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haca: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2002).

貳、「禪林古鏡久埋塵」：律藏的渴求

「禪林古鏡久埋塵，為法亡身幾個人。五十三參今古在，八旬行脚也辛勤。」⁴⁹這是越南臨濟宗第三十六祖如澄麟角禪師（1696-1773，以下簡稱如澄）任命弟子性泉禪師（?-1761，以下簡稱性泉）十八世紀初遠遊中國求法，和帶回越南律藏經書所作之偈語。此次遠遊的原因是，如澄指出當時「大道（佛教，筆者註）寥寥，戒律已無聞矣」。⁵⁰顯然如澄「末法」的內涵是由「戒律已無聞」所造成。因此，如上所述從十六到十八世紀佛教復興階段越南律藏現狀，使得如澄有了如此認定。

佛教復興常需要對整頓戒律提出要求。如同中國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末佛教狀況一樣，雖然蓬勃發展，但表面往往浮華而無實學，致使律學衰微。⁵¹這是明朝時期白雲棲株宏（1532-1612）、蕩益智旭（1599-1655）到最有名的弘贊禪師（1611-1685，以下簡稱弘贊）決心弘揚律儀、顯揚戒律的動機，他們編撰經書流傳萬世。從莫朝結束後到十七世紀初，越南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背景形成一種特殊的「宗教力量」。包括黎孟撻在內的越南研究者，他們的論著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定義下，均提及此一力量。但直到黎國越從碑文和佛教文獻雙重考察之下，始將「宗教力量」定義清楚為禪師—僧官—半世，該隊伍的組成：

包括僧統、僧剛、僧正、僧副、禪僧、具壽、符錄法師（從僧錄司出身）、道司（屬尚林院）、雅淡以及上千位鄉村寺廟系統，大部分尚未找到資料證明他們的出處與竹林禪派的關係。他們大部分不遵守臨濟—曹洞禪派修行規定，多半都有妻子、子女、俸祿，宗教信仰混雜。⁵²

49 如澄麟角禪師作給性泉禪師遠遊前之偈語。福田（補遺）：《繼燈錄》（河內：社會科學通訊院藏刻印本，1859年，編號：HN.0356），下集，葉45下。

50 福田（補遺）：《繼燈錄》，葉45下。

51 參考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王建光：《中國律宗通史》（江蘇：鳳凰出版社，2008年）。周齊：《明代佛教與政治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52 Lê Quốc Việt, “Ghi chú về thiền sư Minh Lương Mãn Giác (?-1675) đời thứ 35 phái Lâm Tế tháp Kim Cương, chùa Vĩnh Phúc, núi Côn Cương,” *Đặc san Suối nguồn*, số 8 (năm 2013), tr.

「宗教力量」若從戒律的角度來看，固然帶有地方性質和很多弊端。直到一六三三年，拙拙北河之行事件，結束該力量獨大的背景，形成宗派方面的僧官—半世和曹洞，以及清規戒律方面的客—越，和真—俗共存的背景。

據《祖師出世語錄》，拙拙於一六三〇年離開中國。在高棉、占城、大越南河等地雲遊三年後來到北河，並帶來一些不知名目的經典，已知其中有《水陸諸科》，為當時開壇為亡靈祈福時使用。因此，拙拙得到黎皇鄭主的信任，為臨濟宗派在越南北部的穩固發展奠定了基礎。拙拙之後，臨濟宗派後分為兩支，即明良禪師（?-1675，以下簡稱明良）⁵³支派（如澄的祖師，越南河內應和縣人）和明行在在支派。拙拙曾依照鄭樞（1577-1657）⁵⁴的意願，委託明行在在去中國求取經書。明行在在所帶回來的經典藏於佛跡寺，部分得到刻印並流傳，其他則仍保存在北寧省佛跡寺當中。但經過時間摧殘，如今已無跡可考當時被帶回越南的是哪些書籍。⁵⁵但可以間接通過明行在在及其弟子在筆塔寺當住持時所刊刻的經書，來假設明行在在從中國帶回越南的經書，如《心珠一貫》（慶德三年〔1651〕刊刻）、《淨慈要語》（重刊甲戌崇禎本〔1634〕）⁵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直說》（盛德二年〔1654年〕刊刻）⁵⁷和《天童頌古集》（盛德五年〔1657〕初刊，現存為景興二十四年〔1763〕重刻本）。但這四部作品都不是戒律經典。由此可見，從實踐的角度來看，雖然拙拙已把明朝清規戒律帶到越南，但在臨濟宗宗門內部，明行在在支派尚未找到其所流傳的戒律經書。

明良與其宗門同樣相當關注清規戒律，尤其是經典。⁵⁸現今的史料只記

92.

53 明良禪師的卒年係根據昆剛山永福寺《金剛寶塔碑詞》內容。

54 這次求經的確切年代未知。

55 法國遠東學院曾於1930年重修寺院時收集佛跡寺的雕版，現今雕版收藏地未詳。

56 〔明〕永覺元賢：《淨慈要語》（河內：漢喃研究院藏兩本，寧福寺重刊於1876年，編號：A.2054；乾安寺重刻於1837年，編號：AC.316）。參考 Nguyễn Tuấn Cường, Nguyễn Đình Hưng, “Buddhist Print Culture and Knowledge Network in North Vietnam from Eigh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A Case Study of Càn An Temple’s Woodblock Collection,” The 2018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rinting Woodblocks (IAPW) Symposium: Cultural History of Printing Woodblocks in Asia – Identification and Comparison (Seoul: Seoul University, 2018).

57 〔明〕憨山德清：《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直說》（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1654年，編號：AC.301）。

58 現存的史料很少明良禪師信息，生卒年未詳，出家之年遺跡重要事跡尚無記錄。

載明良籍貫是河內應和縣，其他重要信息如生卒年、出家之年、重要事跡都未詳。然而，根據黎國越研究，明良於景治五年（1667）曾刻印《梵網經菩薩戒義疏發隱》一書，藏於永福寺，該本於嗣德二十三年（1870）重刻，⁵⁹該書的另一種刻本藏於河內館使寺。⁶⁰明良於兩年後刻印《佛說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新疏》。

真源正覺（1646-1726，以下簡稱真源）為明良的衣鉢繼承者，繼承老師對於戒律關注的志向，編撰《宗師發登壇受戒體式》⁶¹一書。該書被認為成書於一七一一到一七二六年之間，而現存的版本是景興九年（1748）重刊本。黎孟撻指出該書編撰的資料來源有兩種，其一是真源直接引用的著作，如《大般涅槃經》（曇無讖譯，亦稱北本）、《梵網經》（鳩摩羅什〔344-413〕譯）、《戒壇圖經》等。其二，通過研究、對照《尊師發冊》與佛教戒律經書文辭，來確定真源所參考的文獻。越南的文獻有《釋傳度門公文》（作者可能為法螺禪師）。中國的文獻有《釋門疏式》（全稱：《雅俗通用釋門疏式》，冰雪道人修訂）或《釋門疏式》的基礎作品，如《宗賢遺範》、《安事須知》、《華嚴經》、《毗尼日用錄》等。

真源在安子山龍洞寺傳戒給如澄。如澄，號高禪、救生上士，出身富貴，俗名鄭什，晉光王鄭柄（1688-1703）之子，娶黎熙宗（1663-1716）第四女為妻。如澄半世出家，成為北越南臨濟宗第三十七代祖。禪師結合（越南）竹林安子禪宗與（中國）河北臨濟宗的禪學，形成蓮宗派，發展到全北河。⁶²如同真源被認為是「北河佛教的光明燈」⁶³、竹林禪派復興貢

59 Lê Quốc Việt, “Ghi chú về thiền sư Minh Lương Mãn Giác (?-1675) đời thứ 35 phái Lâm Tế tháp Kim Cương, chùa Vĩnh Phúc, núi Cồn Cương,” tr. 92.

60 Nguyễn Đình Hưng, “Sơ thám kho sách Hán Nôm chùa Quán Sứ,” *Thông báo Hán Nôm học năm 2016* (Hà Nội: Nxb. Thế giới, năm 2017), tr. 281-292.

61 本文主要引用 Lê Mạnh Thát, *Chân Nguyên thiền sư toàn tập*, tập 1 (Sài Gòn: Tu thư Vạn Hạnh xuất bản, năm 1980), tr. 43-109.

62 蓮宗祖庭蓮宗寺建於 1733 年黎裕宗時期（1705-1729），今坐落於河內白梅坊。1841 年因避阮朝紹治皇帝（綿宗）諱而改成蓮派，蓮宗寺改為蓮派寺。經過多次重修，現今蓮派寺是越南佛教重要山門之一。該寺還保存很多佛教雕版和佛教漢喃書籍。許多研究者認為蓮宗寺也是後黎朝的蓮花寺，此一疑問已被釋同養否定，參考 Thích Đồng Dưỡng, “Chùa Liên Hoa thời Hậu Lê: Thứ đặt lại vấn đề chùa Liên Hoa có phải là chùa Liên Phái hay không?,” *Văn hoá Phật giáo*, số 112 (năm 2010), tr. 6-9.

63 Nguyễn Lang, *Việt Nam Phật giáo sử luận*, tr. 538.

獻者，用重刻和傳播方式挽救該宗派書籍，⁶⁴真源的學生受師傅之命繼續恢復越南佛教經典。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禪師選擇重刊前世著作，如一七一五年如智禪師（?-1722）重刊《禪苑集英》、一七六三年淨光禪師重刊《上士語錄》；或編撰大越佛教宗派歷史，如一七三四年如山禪師編撰《繼燈錄》。如澄卻十分關心戒律，從他在龍洞寺修習，只是一位法號如如的沙門開始，如澄就已編撰《五戒國音》、⁶⁵喃譯有關戒律經書，如《出家沙彌十戒國音》。⁶⁶除了喃文著作外，如澄還考證並為《毗尼日用錄》⁶⁷寫序。此文本完全可能是北河臨濟宗所流傳的版本，並被真源引用來編撰《尊師發策》。如澄在《五戒國音》和《十戒國音》用了兩句喃字六八體詩開題：「如如啣教真源，演揚律藏流傳數賒（喃字原文，漢譯為：如如依真源之命，發揚律藏傳萬世）」，這兩句顯示如澄宗門非常注重律藏問題。

不僅如澄宗門，其他宗門名僧也體現對當時戒律的關注。其中的代表有竹林禪派復興貢獻者——明州香海禪師（1628-1715）⁶⁸編撰喃字《解沙彌戒律》。不久之後，性廣禪師（1694-1768）⁶⁹編撰《沙彌尼學法威儀國音》⁷⁰、《尼八敬法方言》，⁷¹這些都是出家學佛的經書。可見，當時律藏

64 參考 Lê Mạnh Thát, *Chân Nguyên thiền sư toàn tập*; Phạm Văn Tuấn, “Kiến tính thành Phật” của Chân Nguyên thiền sư: giới thiệu và khảo cứu (Luận văn Thạc sĩ Đại học Khoa học xã hội và nhân văn [Hà Nội], năm 2007). Thích Đồng Dưỡng, “Đi tìm một số bài tựa, bạt của thiền sư Chân Nguyên,” *Văn hoá Phật giáo*, số 113 (năm 2010), tr. 16-20.

65 補陀寺（北江省）雕版，共 10 片，刊刻時間未詳。

66 如澄麟角（喃譯）：《出家沙彌國音十戒》（河內：漢喃研究院，景盛五年〔1797〕刻本，崇福寺藏板，編號：AB.366）。雕版藏於普陀寺，存 10 片。

67 崇福寺 1797 年重刊本，藏於法國亞洲學會，編號：Paris. SA. PD.2349。此本是明代崇禎丁丑年（1637）重印本。

68 香海禪師，南河人，向中國禪師圓景、圓寬修道、出家。1682 年到北河行道，來修道之人很多。到 1700 年建設月堂道場，與真元成為復興竹林禪派的重大貢獻者之一。參考 Lê Mạnh Thát, *Toàn tập Minh Châu Hương Hải* (Tp. Hồ Chí Minh: Nxb. Tp. Hồ Chí Minh, năm 2000), tr. 14-23.

69 參考 Thích Đồng Dưỡng, “Giới thiệu con người và sự nghiệp thiền sư Tỉnh Quảng,” *Tạp chí Khuông Việt*, số 9 (năm 2010), tr. 102-108.

70 於《行持集要諸儀》收錄《一時禮誦日用行持集要諸儀》的第二部分（安寧寺藏板，葉 110-115 上）。此是《沙彌尼威儀》裡的《威儀有七十事》六八體喃譯。目前存兩種刻本：第一種是安寧寺藏本，收錄在北圻佛教會刊行於 1943 年刊行的《越南佛典叢刊》。第二種是海陽永慶寺重刊（漢喃研究院藏本，嗣德三十六年〔1883〕沙門清瀝序跋，編號：A. 2446）。如澄麟角禪師的《五戒國音》、《十戒國音》以及《威儀國語》（相傳是真元禪師之徒如氏禪師著作，行狀未詳，筆者懷疑該禪師的真實性，認為如氏是

經典已廣為流傳。除如澄外，其他不同宗派精通戒律的禪師，為了滿足內部修習和當時僧尼需求，也將戒律經書翻譯成喃字。性廣禪師在《略引八敬法敘》指出：「今見我土女人出家頗眾故以此法述為方言（喃字，筆者注）」，⁷²因此，如澄所謂「戒律已無聞」是何種戒律？

根據上述的漢喃戒律經書，可將當時在北河流行戒律經書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喃文，主要是以簡單易懂的語言解釋戒律義理，以作為僧尼剛出家時的學習資料。例如：《如澄演義五戒》、《十戒》、《性廣出家女人解釋修習之法》等。其二是漢文，主要是為中國漢文佛教經典考證、編序等，例如《毗尼日用錄》是進入禪門的基本經書。或根據北國戒律經典來給北河出家人編撰教材，如真源的《尊師發策》。值得注意的是，黎孟撻指出此書已參考並大量徵引《戒壇圖經》。《戒壇圖經》的作者是中國律宗初祖道宣（596-667）。對該書的引用顯示當時大越已經流傳道宣的著作，但真源卻完全沒有提到道宣的兩部重要著作，即律宗最基礎的經典《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簡稱：《行事鈔》）和《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簡稱：《羯磨》）。此種現實顯示，也許當時北河沒有流傳小乘佛教的律藏，而主要是《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等。但在南河卻有很多證據顯示，從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許多重要的律藏經書已在此流傳。《大南實錄前編》記載一七一四年重修天姥寺，阮主遣人如清購經、律、論千餘部。⁷³法專律傳妙嚴禪師（1726-1798），於一七九七年開山富安慈山寺，並使該寺在此處成為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諸僧修習中心。禪師精通律學，曾講解律學，其著作有《毗尼沙彌威儀警策印注要略》、《毗尼日用切要發印音註》、《沙彌律儀要略增註發印》⁷⁴和《事義律要略》。⁷⁵在此之前，元韶（1648-1728）⁷⁶於一六八七至一六九〇年依阮福溱

如澄之別名也）等著作都合釘在該本。

71 合釘於《佛說因果本行》（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1800年，編號：AB.177）。《尼八敬法方言》於嘉隆三年（1804）刻本。景興五年（1744）刻本，雕版藏於補陀寺。

72 參考 Thích Đồng Dưỡng, “Giới thiệu con người và sự nghiệp thiền sư Tỉnh Quảng,” *Tạp chí Khuông Việt*, số 9, tr. 102-108.

73 阮朝國史館（編）：《大南實錄前編》（河內：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編號：R.773），卷8，葉19上。

74 其徒弟全日繼承師父志願，編撰《沙彌威儀增註解元小篇》。參考 Lê Mạnh Thát, *Toàn tập Toàn Nhật Quang Đài*, 2 tập (Tp. Hồ Chí Minh: Nxb. Tp. Hồ Chí Minh, năm 2005).

75 根據 Nguyễn Hiền Đức 的研究，該作品其中一些部分已被印刷，一些稿本藏於富安慈光

(1650-1691) 之命去請僧侶、佛經、法器，律藏有可能被元韶在這趟行程中帶回越南。但是，目前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在一六八二年香海禪師到北河時，律藏經書亦隨之從南河傳播到北河。

在北河缺少重要律藏經書的現實，此一背景也許正是如澄所認定的。「古鏡」兩字無疑是指戒律，即修習者修習、精進的修習手段。「已無聞」所指的是，當時已經沒有戒律相關經書進行流傳，除了《華嚴經》、《梵網經》提到的戒律規定。若有相關記載，也只是初入禪門者的基本規定，但對於修習者的基本工作，如建設戒壇、受戒、傳戒、守戒等卻毫無用處。從「已」字可認為，律藏原來已在越南流傳，特別是陳朝（十四世紀《四分律》已被刊印、講述，如前文所述），但到如澄的時代卻佚失了。如澄宗門內部非常關注戒律，但在國內條件有限的背景下，使得他任命性泉前往中國求學，並蒐購律藏經書帶回越南，此一求經活動的展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⁷⁷

參、「遠求大教，匡復弊端」⁷⁸：律藏的重建

性泉，一云杜多和尚，如澄之徒。⁷⁹從傳承角度來看，性泉在一七三四年為妙圓尼師所立的《寶光寶塔》碑文中自稱蓮宗法子，可見性泉自認歸於如澄宗門。⁸⁰一九二八年蓮派寺《家譜碑記》也確認性泉屬蓮宗派，救生

寺，但在 1929 年被大火全部燒毀。見 Nguyễn Hiền Đức, *Lịch sử Phật giáo Đàng Trong*, tập 2 (Tp. Hồ Chí Minh: Nxb. Tp Hồ Chí Minh, năm 1995), tr. 14.

76 元韶（1648-1728），中國潮州人，到越南行道。香海從南河到北河時，元韶被請當順化僧事的主持人。參考 Thích Thanh Từ, *Thiền sư Việt Nam* (Hà Nội: Nxb. Tôn giáo, năm 2010).

77 有關越南後黎朝佛教經書刊刻與傳播背景，參考李貴民：〈再製與變異：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轉化〉，第三屆「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2019年5月18-19日）。

78 如澄麟角禪師作給性泉禪師遠遊前之偈語。福田（補遺）：《繼燈錄》，卷左，葉 45 下。

79 性泉禪師的生卒年、出家前姓名、籍貫等信息都是禪師圓寂一百年之後的記載。這些信息有的地方互相矛盾。他在自己的兩部著作，前後相差只有幾年而信息卻有些地方不統一。此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筆者將再另文討論。

80 參考安子山華安寺（竹林禪派重地）的《寶光寶塔》碑文。引自 Thích Thanh Quyết, Trịnh Khắc Mạnh (chủ biên), *Trúc Lâm Yên Tử Phật giáo tàng thư*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上士之後的繼燈者。但是，性泉徒弟所寫的一七八〇年⁸¹崇福寺碑文卻把性泉歸為臨濟宗。該論點被福田和尚（1784-1883，以下簡稱福田）⁸²記載在《禪門修持經咒律儀》⁸³和《繼燈錄》當中。他指出臨濟宗已經分成蓮宗、岑山、勤全、浦山等支派。每個支派又分成小派別，各派別中又有諸多禪師。因此，很難確定哪位禪師是宗門的繼承者。將性泉排入臨濟宗祖傳世譜中，臨濟宗是大宗，包括小宗臨濟，也許正是後人對性泉和對臨濟宗功績的評價。

性泉個人行道事業對於整個越南佛教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是他赴中國修習戒律並求經帶回越南。史料對於性泉北行的時間記載眾說紛紜，如在《禪門修持毗尼日用》，福田認為性泉於永佑乙卯（1735）離開大越，而在《竹窻隨筆》，卻記錄此行大約是景興年間（1740-1786）。⁸⁴根據《寶光寶塔》碑文內容來看，一七三四年性泉必定在大越。同時，根據崇福寺一七三四年《重修崇福寺廟庵碑記》來看，大約一七四五至一七四六年性泉興工修建該寺。因此，性泉之行或在一七三四年之前，又或一七三四到一七四五年的十年之間。如澄圓寂於一七三三年，性泉出發時仍被他囑託，可見本次行程最合理的時間是一七三四年之前。⁸⁵

多數針對性泉此次旅程的研究，都是根據福田的《繼燈錄》、《道教

hội, năm 2018), tr. 240-243.

81 杜令銓：《重修崇福寺廟庵碑記》，參 Nguyễn Đình Hưng, “Góp thêm tư liệu về hành trạng của thiền sư Tĩnh Huyền,” Tham luận phát biểu tại Hội thảo các nhà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trẻ, 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Hà Nội: 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năm 2019).

82 關於福田和尚的研究，參考 Thích Minh Tâm, “Vài nét về Phúc Điền hoà thượng, tác giả sách “Đạo giáo nguyên lưu,”” *Thông báo Hán Nôm học năm 1997* (Hà Nội: Nxb. Thế giới, năm 1998), tr. 560-563. Thích Minh Tín, “Tìm hiểu thêm về Sa môn An Thiên,” *Tạp chí Hán Nôm*, số 1 (năm 2008), tr. 48-55. Nguyễn Tuấn Cường (pháp danh: Thích Minh Nghiêm), *Nghiên cứu tác phẩm Đạo giáo nguyên lưu của Hoà thượng Phúc Điền* (Luận án Tiến sĩ, Học viện Khoa học xã hội Việt Nam, năm 2016). Lê Quang Sơn, *Nghiên cứu bản giải âm tác phẩm “Thái căn đằm” của Hoà thượng Phúc Điền* (Luận văn Thạc sĩ,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năm 2012). Nguyễn Quang Khải, “Công đức của một số vị thiền sư tiêu biểu đối với việc khắc ván in kinh sách ở Bắc Ninh thế kỷ XVIII-XIX,” *Nghiên cứu Phật học*, số 5 (năm 2016), tr. 51-55.

83 福田：《禪門修持經咒律儀》（海陽：慧光書院影印靈應寺藏本，1884年）。

84 [明]雲棲株宏：《重刻竹窻舊序》，《竹窻隨筆》（河內：勝嚴寺藏本，編號：TN.049；乾安寺刻印，1832年），葉4下。

85 釋同養認為性泉禪師於1730年離開大越。見 Thích Đồng Dưỡng, “Về niên đại thiền sư Tĩnh Huyền,” *Văn hóa Phật giáo*, số 161 (năm 2012), tr. 9-11.

源流》資料，以及他在《竹窻隨筆·重刻竹窗舊序》的記錄，皆認為性泉是奉黎帝之命去中國求經。⁸⁶《繼燈錄》下集曰：「具奉得旨」。《道教源流》「奉詔求法」條記載：「黎永祐蓮宗寺臨濟譜性泉禪師湛公和尚，奉旨往大清國鼎湖山，慶雲禪寺，學道求戒搜尋經典，將回本國留在京都乾安寺」；⁸⁷《竹窻隨筆》載：「景興年間，臨濟蓮宗寺湛公和尚奉旨往大明國鼎湖山」。⁸⁸此點是否可信，需要考慮以下因素：第一，當時官方所編纂的唯一正史資料《大越史記全書》，未有記載該事件；但其他有關建造寺廟、鑄佛像、考核僧侶等佛教事蹟均有見載。第二，後黎朝以前，官方求經之事，常是皇帝派使臣帶上公文正式赴中國請求，尚未有皇帝命令僧侶前往蒐集經書。第三，黎中興時期的特點是「兩頭制」，⁸⁹即「黎皇鄭主」制度並行，實權屬於鄭主。當時用「詔」字一般是黎帝詔書，「旨」（如：令旨）常是鄭主的命令。因為有時用「詔」，有時用「旨」，所以福田也不清楚性泉受誰的命令。此外，之前雖有明行在在依照鄭樵的意願前去中國求經書，但沒有任何史料證明鄭主有下「旨」類似的求經工作。福田所編的《禪門修持毗尼日用》，與《道教源流》同樣於一八四五年刊刻，當中提到性泉赴中國求法，但沒提到是奉「旨」還是奉「詔」。因此，根據如澄與性泉的對話，需要遠去「求大道」，筆者推測，性泉此行去中國是為了宗門內部的需求，更具體地說即是師父如澄的要求。且為了提高宗門的重要性，求經工作也往往帶有濃厚的王權色彩，這不僅發生在越南，在其他國家也十分普遍。

跋山涉水六個月後，來到大清國廣州府鼎湖山慶雲大禪寺。因為師父如澄交付的大任，以及「尋究經律」的目標，⁹⁰很容易理解性泉為何選擇來到慶雲大禪寺，而非他處。慶雲大禪寺位於鼎湖山，建於一六三六年，注重「禪、淨、律」同修。該寺在整理、編撰戒律方面卓有成就，同時組織法師開壇受戒，從明末到清代，直至現代在嶺南和東南亞地區仍然有著相

86 〔明〕雲棲株宏：〈重刻竹窗舊序〉，《竹窻隨筆》，葉4下。

87 福田（編）：《道教源流》（河內：漢喃研究院藏，編號：A.1825），葉15。

88 〔明〕雲棲株宏：〈重刻竹窗舊序〉，《竹窻隨筆》，葉4下。

89 黎金銀語，請見註41。

90 福田（補遺）：《繼燈錄》，葉45下。載言：「自此思為深入，發弘誓願，尋究經律〔……〕。」

當大的影響。根據《鼎湖山志》記載，這個地方在唐代即由六祖惠能禪師（638-713）的高徒智常禪師在此弘法。⁹¹慶雲寺建立後，經過歷代的發展與增修，禪寺規模極為宏大。兩位開山祖師天湖棲壑道丘禪師（1586-1658）和弘贊都是中國佛教史中「釐定戒律」的重要人物。「鼎湖戒」⁹²指在慶雲寺成規律戒、儀規傳戒，弘贊「致使嶺南禪門重新走上嚴明戒律之路」。⁹³慶雲寺也是當時唯一符合性泉「遠求大法」目的的寺院。

《繼燈錄》中有關福田對性泉年表的記載，指出性泉在鼎湖山勞役三年，又學習了三年經律，方於一七三五年受比丘菩薩戒、具足戒。⁹⁴性泉不止在當時中國的戒律中心學習，還參與了「三師七證」的「三壇大戒」傳戒大典，是由方丈其金光端⁹⁵主持的兩百人大典。這是越南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首次有越南禪師按照當時中國佛教的標準儀式來受戒，這也成為性泉回國後實踐戒律活動的基礎，其貢獻被福田評價為：「潛者復興，光者復續」，這應該指的是《繼燈錄》：「一切僧尼請師為和尚重授戒法」⁹⁶以及《竹窻隨筆》：「登壇受戒，朝參暮叩」⁹⁷當中的內容。可見，「鼎湖戒」在受戒壇的聲望，使得受此戒的唯一越南禪師具有崇高權威，可在地方建設三壇大戒，並為僧尼受戒。因此，即使曾在越南受戒的佛門子弟，都認為可以跟性泉重受戒法，是一件對自身修行的重新肯定。蓮派寺現存一八

91 [清]丁易修、釋成鷺（纂）：《鼎湖山慶雲寺志》（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AC.463）八卷，善本電子書由哈佛燕京圖書館掃描。越南福田和尚於1844年重刻。

92 李福標：〈論鼎湖山慶雲寺的戒律學傳統與地位〉，《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5期（2016年9月），頁30。

93 周軍：〈《鼎湖山志》與明清之際嶺南禪宗〉，《肇慶學院學報》，第30卷第4期（2009年7月），頁36-41。

94 福田（補遺）：《繼燈錄》，葉46上。載言：「時師二十五歲，求進比丘菩薩戒〔……〕與授具戒。」

95 慶雲寺住持制度有兩個階段：一，明末清初有七位祖師，最後是成鷺。二，清代中葉到民國時期，住持職位三年一制。雖沒有明確的時間，而每位住持在職間只開場傳戒一次。根據其金光端塔碑，這位在退院前，於1747年勉強應邀南交國主之請到越南「談玄講道」。參考《鼎湖山慶雲寺歷代住持塔銘》（肇慶：慶雲寺管理委員會，2014年）。尚未找到越南資料有記載此事，金光端到越南時，性泉禪師已經圓寂兩年，不知這位法師是受黎帝還是鄭主之請？在越南之間是否有給任何人受戒？若能蒐集到相關資料，筆者將持續深入探討此一課題。

96 福田（補遺）：《繼燈錄》，左卷，葉46下。

97 [明]雲棲株宏：《竹窻隨筆》，葉5上。

七二年的《重興蓮派寺離塵院別誌》肯定「我國有具宿三壇從此始」；⁹⁸《法慧塔并銘》記載性泉為僧人（例如：海賁）傳戒。⁹⁹因此，性泉已經完成如澄任命求法的第一心願。如澄的第二心願，則與性泉在越南傳播、流布中國戒律經典的活動有關。

根據《繼燈錄》，性泉從鼎湖「請得經律論三百部，一千餘卷。」¹⁰⁰性泉回國時，如澄已圓寂，因此性泉不留在蓮宗寺，反而選擇到崇福寺（今越南河內仁睦社）當住持。他所帶回的經書藏於乾安寺屬南同寨（黎朝時代的中都，今越南河內棟多郡南同坊）。¹⁰¹此地是性泉與徒弟進行刻印經書活動，從而使該寺成為十八世紀後半葉北河的重刊經書中心。根據《瀉山警策文》的序文，寬翌禪師到乾安寺時已讀到性泉刻印的經書，並稱此處為「乾安經坊」。¹⁰²此點證明，當時乾安寺所刊刻的經書數量，以及經書類目達到一定程度，始能被稱為「經坊」。

因中國帶回的經書，乾安寺經坊對戒律經典弘傳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四分律》。福田在《竹窻隨筆》指出，自從有了乾安寺刻印的經書，大越才開始有「四分律，六道集，解惑，竹窻等文」。¹⁰³調查越南北方寺院所藏經書顯示，其他寺院都是到乾安寺來請求副本，或在山門流傳、使

98 清莊：《重興蓮派寺離塵院別誌》（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片，編號：00204）。

99 不知撰著人：《法慧塔并銘》（河內：漢喃研究院藏，編號：00423）。

100 福田（補遺）：《繼燈錄》，卷下，葉 46 下。載言：「請得經律論三百部，一千餘卷」。寺院建於 1612 年，由當時僧侶與貴族的錢財和捐助，不斷重修和完善於 1697 年和 1757 年。乾安寺的歷史，參考 Nguyễn Tuấn Cường, Nguyễn Đình Hưng 2018 “Buddhist Print Culture and Knowledge Network in North Vietnam from Eigh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A Case Study of Càn An Temple’s Woodblock Collection.”

101 Nguyễn Lang, *Việt Nam Phật giáo sử luận*, tr. 551.認為：「大約兩百部經書已經被刻成雕版並印刷於該處普及（越南北方，作者註）。許多雕版藏於崇福和建安。」筆者推測，崇福可能是河內的崇福寺（即上提的三玄寺），建安可能是月光寺（建安，海防省），這都是性泉禪師曾任持的寺廟，或與這位和尚同師門。因欠缺資料，本文尚未提到兩所寺廟的刻印和傳承經書問題。

102 〔唐〕瀉山靈佑：《瀉山警策文》（河內：勝嚴寺藏本，編號：TN.080），葉 1。載言：「曹峒宗第六世祖勅賜道源和尚寬翌祖師，親詣乾安經坊，拜讀是文，再三披閱，深得其妙，畧演國音，俾便初學行持。」

103 《竹窻隨筆·重刻竹窻舊序》載言：「景興年間，臨濟蓮宗寺湛公和尚奉旨往大明國鼎湖山，得妙旨於金光端和尚，登壇受戒，朝參暮叩。多得經典將回本國京都乾安寺。若刊經者，始有法華知音，四分律，六道集，解惑，竹窻等文盛行于世。」，葉 5 上。

用、或製作底本來重刊、重印。可惜的是，目前筆者尚未找到性泉在世時藏於乾安寺的任何刻本或雕版。但通過考察現今乾安寺所存的佛教雕版，筆者希望釐清該地印刷戒律經書的狀況。

與補陀、永巖、蓮派¹⁰⁴等名藍的雕版相比，乾安寺的雕版可謂命運多舛。二〇一六年之前，阮廷興調查拍攝雕版之時，尚無人知曉乾安寺雕版的存在。¹⁰⁵經統計，現存十九部經典的三百三十一面雕版（版雙面刻），沒有任何一部經典是完整的。其中除了十二片雕版損毀嚴重，無法歸類為何種經典外，其餘兩百七十面雕版（十八種經典）可確定為佛教經書雕版。詳細內容如下表：

【表一】¹⁰⁶乾安寺所藏佛教經典木刻板¹⁰⁷

書名	木板面數	年代	備註
高王觀世音真經	10	1812 前	藏書編號：AC.50 與 VHv.1067 可能有關係

104 參考 Phạm Thị Huệ, Nguyễn Xuân Hoài, *Mộc bản chùa Bồ Đà để mục tổng quan* (Hà Nội: Nxb. Văn hoá Dân tộc, năm 2015). Trịnh Khắc Mạnh, “Di sản mộc bản chùa Vĩnh Nghiêm và chùa Bồ Đà tỉnh Bắc Giang trong đời sống văn hóa Việt Nam,” *Tạp chí Hán Nôm*, số 2 (năm 2017), tr. 21-29. Vũ Đức Nghiệu (chủ biên), *Mộc bản chùa Vĩnh Nghiêm chùa Bồ Đà: Những định hướng bảo tồn và phát huy giá trị của di sản* (Hà Nội: Nxb.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năm 2018).

105 據 Nguyễn Đình Hưng (阮廷興) 口述：2016 年 4 月 1 日，他收到 Giang Mạnh Cẩm (江孟錦，文化大學學生) 提供的訊息，得知在乾安寺廳外有很多雕版。阮與江向該寺住持 Đàm Thanh (譚青) 申請考察、點閱和拍照這些雕版，以作為資料保存。當時因為該寺正在維修，雕版已搬至廳外保存。2016 年 4 月 6 日，阮廷興、江孟錦、Lê Quốc Việt (黎國越)、Trương Cẩm Hoài (張錦懷) 等 4 人經過 4 天考察、點閱、拍照，確認乾安寺版庫約有 150 塊雕版，保存狀況欠佳，有些已被蟲蟻蛀蝕，有些則已損壞無法辨認文字。經寺院同意，工作人員對書目進行分類並拍照，並丈量尺寸。2018 年 7 月 13 日，阮廷興再次回到乾安寺調查時，住持告知寺院在維修的過程中，雕版已全部遺失。雕版的調查結果，參考 Nguyễn Tuấn Cường, Nguyễn Đình Hưng, “Buddhist Print Culture and Knowledge Network in North Vietnam from Eigh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A Case Study of Càn An Temple’s Woodblock Collection.”

106 表中 A、AC、VHv 為漢喃研究院之藏書編號；R 為越南國家圖書館之藏書編號；Paris. SA. PD 為法國亞洲學會之藏書編號；TN 為河內勝嚴寺之藏書編號；PN 為普仁寺之藏書編號。以下表二、表三同。

107 參考 Nguyễn Tuấn Cường, Nguyễn Đình Hưng, “Buddhist Print Culture and Knowledge Network in North Vietnam from Eigh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A Case Study of Càn An Temple’s Woodblock Collection.”

德生錄	28	無	藏書編號：AC.374（乾安寺重刻於1823年）
金剛經	32	1745	藏書編號：AC.254（乾安寺重刻於1800年）
解惑編	62	1796	〔清〕弘贊編，共2卷。藏書編號：AC.598/1-2（福田重刻乾安寺本於1859年）
因果實錄	23	1846	藏書編號：AC.427（乾安寺重刊康熙壬午本）；藏書編號：R.5856（乾安寺本重印於1932年）
西方香林禪師淨土文	10	1796	
淨慈要語	34	1837	藏書編號：AC.316（乾安寺重刊府本於1837年）
淨土懺願	15	1865前	雙面跟《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為同一個木刻版；藏書編號：AC.424、TN.058、TN.122（重刻乾安寺版）
小阿彌陀經	2	無	
阿彌陀經	20	無	經折裝
阿彌陀經	9	無	包背裝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	3	1865前	雙面跟《淨土懺願》為同一個木刻版；藏書編號：TN.058、AC.133（重刻乾

			安寺版)
懺悔文	2	無	
禮佛儀式	4	無	〔清〕弘贊編，共1卷
普門(品)	8	無	藏書編號：AC.71、R.1191、TN.125 版式、字形與乾安寺雕版類似。
施食	2	無	
廬山蓮宗寶鑑	5	無	
雲頂棲壑和尚不置田座約	1	無	
零星	12	無	
總計	69		

由此可見，目前乾安寺所藏的佛教雕版¹⁰⁸大部分都是非律藏經書。此一現象引發筆者疑問，即該寺的律藏雕版是因歲月而損壞？還是因已流傳到其他山門？若是因為歲月流失，雕版受到毀壞，那麼顯然無法找到性泉從北方帶回的《四分律》雕版和其他經書。另一方面，根據考察流傳在乾安寺雕版（已遺失或現存）所印出的經書，或可為這些經書的流傳狀況提供了一個新切入點。但需要注意的是，乾安寺的經書還被其他寺院作為底本來進行刊刻，其代表性泉在崇福寺重修時所主持的刊刻經書活動。¹⁰⁹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往生集》¹¹⁰序文，當時沙門清錦¹¹¹攜帶其書請乾安

108 除了佛教經書外，還有49版刊刻《少微》一書，此書屬儒家書籍，無列入表內。

109 杜令銓：《重修崇福寺廟庵碑記》載言：「慶成紺殿，珠宮，長廊，曲【檻】，燦然百新。既又為之造聖像、刻真經。」

110 〔明〕雲棲株宏：《往生集》（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AC.157、AC.342；乾安寺重印本，1832年）。

寺僧侶刊刻。此點有兩種意義：第一，這可確定，直到明命十三年（1832）乾安寺仍維持作為刊刻佛經中心的角色。筆者考察越南佛教經書時，許多寺院雖在名義上是刊刻佛典活動的主持者，但其實都是委託給經坊乾安寺代辦。第二，除了刊刻性泉所帶回的經書，該寺還刊刻其他寺院帶來的經書。因此考察乾安寺經書時，需有足夠證據才可以肯定是否屬於性泉所帶回的經書。

肆、「弘四分律，自師為始」：律藏的發揚

「弘四分律，自師為始」，¹¹²這是福田評價性泉對越南佛教歷史的貢獻之語。這個總結應跟性泉從中國「請得經律論三百部，一千餘卷」有關。「律」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從在越南流傳的漢文律藏來說，¹¹³這個認定十分有趣。因為，現在很難辨別福田提到《四分律》的明確內涵。基本上有三個可能性：一、只提到了《四分律》（梵語：Dharmagupta-vinaya，又稱《曇無德律》、《四分律藏》）的譯本，後以漢語集結為律藏，收入《大藏經》；二、《四分律》的中國歷代注釋本有唐代法礪（569-635）《四分律疏》、唐代道宣《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唐代懷素（725-785）《四分律開宗記》、宋代圓照《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等；三、主要包含慶雲禪寺弘贊關於戒律的著作。¹¹⁴

目前乾安寺沒有保存任何戒律雕版，該寺的經書都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刊印，沒有任何信息顯示它們與性泉的關聯性。性泉本身也沒有記載帶回越南的書籍。因此要釐清當時性泉所帶回的戒律經書，唯一方法，就是間接研究由福田編撰，性泉自中國帶回越南的書目。福田根據考察當時性泉所帶回的書籍狀況，並記載附錄於其著作《道教源流》。黎國越認

111 除了該書外，在乾安寺的其他雕版當中，沙門清錦與照堅組織刻印《禮佛儀式》，照堅又是《因果實錄》刊刻的主持人。

112 福田（補遺）：《繼燈錄》，葉46下。

113 如上所述，在性泉禪師之前，律藏在李陳時期由《大藏經》的「進口」而傳播到越南。但是，目前還沒有足夠資料確認哪種版本傳播到越南時還存於世。

114 關於弘贊和尚的著作，參鄭興中：〈弘贊在嵇生平與著作述略〉，《肇慶學報》，第38卷第1期（2017年1月），頁47-51。

為：「在鼎湖慶雲寺遊學之後，性泉帶回國大量三藏教典，藏於乾安寺，現今我們根據福田著作中的統計而知書日和卷數。」¹¹⁵他所說的「統計」是指《沙彌律儀解義》當中的一個目錄——《重治比尼律藏總目》。通過對該目錄的考察，筆者發現，該目錄中並沒有任何信息足夠顯示與性泉帶回書籍有關。該目錄也許只是律藏總目而已。

一八三五年福田編撰《道教源流》。在一百多年間，該目錄顯示性泉帶回越南書籍的狀況。該目錄的三百多部經書，只有一百五十二部留存。¹¹⁶其中，有些只有書名而無提要，原因是「本部蠹損」。若只統計有明確卷數的一百一十八部，其總數為一千一百三十卷。假設其他三十四部無提要，每部最少有一卷，那麼這一百五十二部的卷數達到一千一百六十四卷。可見，若有三百部，卷數還會更多。目前尚不知曉福田在《道教源流》所稱的「卷」是否完全和《繼燈錄》所提到的「卷」一致。如果一致，那麼兩個書目內的在差異也值得注意。¹¹⁷

福田編撰書目的方式，難以確認該書是否為戒律經書。因其雖然是根據經書名稱編目，但卻是扼要簡寫名稱。略舉幾例，簡略前綴與後綴如：《資持》（1卷）應該是《四分律行事抄資持記》的簡寫；¹¹⁸只簡略後綴如：《竹窻》（3卷）當為《竹窻隨筆》，¹¹⁹略寫二字；¹²⁰或只簡略前綴如《內法傳》實為《南海寄歸內法傳》，且均不署作者姓名、編撰年代以及印本或刻本。¹²¹在此背景下，下表筆者統計福田對性泉帶回戒律經書的彙

115 Lê Quốc Việt, “Giao Châu một nẻo lối thông Tây vực: Thiên phái Trúc Lâm tiếp cận từ góc độ kinh lục,” *Đặc san Suối nguồn*, kỳ 1, tr. 71.

116 福田（編）：《道教源流》（河內：漢喃研究院藏，編號：A.1825），葉 15。載言：「奉詔求法，黎朝永佑蓮宗寺臨濟譜性泉港公和尚奉旨往大清國鼎湖山慶雲大禪寺，學道受戒、搜尋經典將回本國，留在京師乾安寺。」

117 實際上，福田和尚在編撰的過程，同一個內容在不同的著作也出現矛盾信息。參考 Thích Đồng Dũng, “Về niên đại thiền sư Tính Tuyên,” *Văn hóa Phật giáo*, số 161, tr. 9-11.

118 福田（編）：《四分律行事抄資持記》（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手抄本，編號：AC.682/1-20），共 5228 葉。

119 漢喃研究院藏 2 種刻本（三冊），編號 AC.350 和 AC.196/1-2；勝嚴寺藏編號 TN.049；蓮派寺（無編號）等。

120 漢喃研究院現藏 2 種刻印本（每種含三卷），編號 AC.350 和 AC.196/1-2。

121 這種縮寫，以越南為例，是印刷與管理古籍的實際需求。禪師常以書名的前兩到四字寫於書背，以便於尋找書籍。

整（應該會有訛誤）：

【表二】性泉帶回越南（或相關）之戒律經書

書名	卷數	現存狀況
菩薩五戒威儀經	無	未見
像法決疑經	無	未見
毗尼毗婆沙論	無	未見
宋高僧傳	無	未見
根本律	無	未見
內法傳	無	《南海寄歸內法傳》，藏書編號：AC.681/1-2（刻本）
雜事律	無	未見
毗尼切要	1	《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記》，藏書編號：AC.478（刻本）
資持	1	《四分律行事抄資持記》，藏書編號：AC.682/1-20（手抄本）
弘戒錄	1	《楞庵語錄》，藏書編號：AC.454（刻印本）
比丘戒錄	1	未見《比丘戒經》，藏書編號：TN.145（刻印本）
搜神記	1	未見
梵網合註	10	《梵網經合註》，藏書編號：AC.180/1-2（刻印本）
羯摩指南	10	《羯摩指南》，藏書編號：AC.132/1-2（刻印本，12卷）
六道集	2	《六道集》，藏書編號：AC.129（刻印本）、Paris. SA. PD.2355 (1-2)（刻印本）
佛門定制	2	未見
戒壇	3	《刪補受諸戒壇》，藏書編號：A.2571 普進和尚題引於嗣德三十四年（1881），重刻成泰五年（1893）。
四分如釋	4	《四分戒本如釋》，藏書編號：AC.181/1-2（刻印本）；見《四分戒本如釋語》，藏書編號：TN.001-004（刻印本，12卷）。
治禪病秘要經	5	未見
優婆塞戒	5	未見
羯摩刪補	8	《四分律刪補隨羯摩抄》靈光寺（河內）重刻

		康熙壬申本（1692 年），藏書編號：AC.149/1-2（刻印本，總 12 卷，闕第 7-9 卷）
釋子須知	8	未見
總計	69	

如此，在福田編目的一百五十二部經書之中，¹²²有二十二部最少六十九卷屬於佛教戒律的內容。福田所編之書現在共留存二十八部（書目共一百五十二部），其中戒律十部，另外十二部戒律經書在越南尚未尋獲。¹²³根據表二，部分經書暫時不能確定其內容與版本的情況，但基本被包括在經律的三個類別之中。《四分如釋》屬於《四分律》的第一部分，規定了僧侶修行的戒律。《資持》（全名：《四分律行事抄資持記》）是《四分律》的註解。最後是弘贊關於《羯摩刪補》等戒律的陳述。由此可以得到初步結論，福田歌頌性泉所用的《四分律》概念不僅單指這部書，而是包括所有關於戒律的經典，主要為《四分律》。

目前尚不得知福田是否有統計性泉所帶回的書籍，以及當中有哪些戒律經書。這些書籍因為遺失、損壞，或因為福田只盤點一所寺廟，而忽視了其他寺廟曾經借閱這些書籍進行重印或傳教的活動。因此，要釐清性泉在越南弘揚中國戒律的功績，我們試圖還原一八三五年「福田目錄」所缺漏的書籍。根據現存佛教經書，概可將其區分為三類：

第一類書籍是，書上的信息或佛教經典重刊雕版，有明確記載是由性泉從中國帶回。此論點根據目前筆者找到三種文本，兩種藏於河內青威縣巨溪社勝嚴寺（俗稱曲水寺），¹²⁴另外一種藏於漢喃研究院：

一、《滄山警策文》

122 筆者已經統計福田和尚在《道教源流》所記載性泉帶回的 152 部書籍，並參考越南各地（如儲存中心、國立及私立圖書館、寺院、私人藏書等等）現存的書籍進行對照，因篇幅限制，無列入本文。

123 越南佛教經典不集中的狀況之下，筆者難以確定已經概括全部資料。目前筆者暫時引用已經公佈的資料（國立圖書館、寺院、佛教經典數位化等）和個人多年搜集的資料。

124 已經被美國字喃遺產保存基金會（Vietnamese Nôm Preservation Foundation）數位化，另一種藏於漢喃研究院。

藏書編號：TN.042，成泰己亥（1900）夏刻印，六十八頁。

大明瀉山靈祐大祖師撰文；大南沂江道源和尚寬翌祖師演國語；後學春雷法孫正大校訂重刊，興福寺藏板。

重刊演音小引中寫明：「於我越黎永祐年間杜多和尚奉旨北往求法。馱來昇龍城之南同寨乾安寺珍藏之。」

二、《淨土懺願》

一印本，藏書編號：TN.122，成泰丁酉（1897）刻印，七十八頁。序中一些文字殘損，但仍可以根據內容得知，此書為性泉帶回，之後重刻。「我國黎永祐間，湛公祖師就北國請回而板留乾安寺。嗣德乙丑永嚴法主得次集。」¹²⁵

三、《毗尼日用》（全名：《禪門修持毗尼日用錄》）

一印本，藏書編號：A.2347，紹治五年（1845）刻印，兩百七十八頁。

其中葉三上寫明：「昔比丘錄是性泉禪師祖師請得正本於大明國將回本國留于乾安寺後海育禪師刊刻。」

第二類書籍為可能由性泉帶回的經書。此類是一些不在福田所編的書目裡，但現今仍在越南流傳的弘贊著作。該論點涉及到性泉在中國求學和受戒的山門——鼎湖山慶雲寺，此地以編撰戒律經書聞名，由棲壑開山至第七代成鷲（1637-1772），其間二代祖師弘贊編撰戒律甚豐，確立了鼎湖派在戒律中的地位。李貴民在〈越南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初探〉中寫道：

至此越南的戒律之學又重新恢復。而性泉禪師所帶回來的經律論當中，以弘贊法師的著作為最主要，目前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

125 雖然同名文本可於漢喃研究院（藏書編號：AC.424）和勝嚴寺藏書閣（藏書編號：TN.058）找到，但這些版本上都沒有標註來源。

資料庫」中仍保存不少種類。¹²⁶

李貴民把弘贊的著作和藏於漢喃研究院的經書來進行對照，以論證其觀點。筆者認為，李貴民指出弘贊有四本著作已經出現在福田所整理的書目當中，即《六道集》（弘贊編輯嚴春廣題重刻序，靈光寺重刻，成泰乙己〔1905〕）；《解惑編》（弘贊編，板留含龍寺〔北寧省〕），《四分戒本如釋》（刻印本）；《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刻印本）。由此可見，李貴民的做法是完全有章法可循的。

在表二書目當中，李貴民指出現存於漢喃研究院的七本屬於弘贊著作。經過對照，筆者發現這些書名沒有出現在「福田目錄」中。筆者除了查看漢喃研究院所藏的漢文佛教經書（編號 AC）外，還對照藏於越南與其他國家檔案館及私人所藏的漢文經書，詳細如下表：

【表三】越南現存弘贊禪師著作（「福田目錄」以外）¹²⁷

書名	存所與編號	現存狀況
（般若）心經貫義	AC.506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添足之後
滄山警策句釋記	AC.140	刻印本
	AC.136	
沙彌律儀要略增註	AC.622	比丘昭妙寫序，光明寺重刻於明命二十年（1839）。
	AC.338	濟川寺重刻於嗣德三十三年（1880）
	AC.311、 AC.345、 Paris. SA. D. 2332	多寶寺重刊於嗣德三十四年（1881）
	AC.164	按佛跡寺木刻板

126 李貴民：〈越南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初探〉，《佛光學報》，新 6 卷，第 1 期（2020 年 1 月），頁 299。

127 這個表不包含在越南現存的福田和尚書目裡面所提到的株宏著作，如《放光般若波羅密經》（刻本，4 集，30 卷）；《佛說長阿含經》（刻本，3 集，22 卷），《增一阿含經》重刻在龍隊山（嗣德元年，1848）；《竹窻隨筆》等。這部分書籍現在還存，也曾經被「福田目錄」提到。

	TN.080	支那撰述、菩薩戒弟子雲棲株宏（輯）、菩提心比丘鼎湖山沙門弘贊（註），多寶寺重刊於嗣德三十四年。
	R.198	菩薩戒弟子雲棲株宏（輯）、安樂禪師（題序），多寶寺重刊於嗣德三十四年。
八關齋法	AC.143	無
四分律名義標釋	AC.699/1-10	〔清〕弘贊（編）
諸經日誦	AC.258	〔清〕弘贊（校訂），1600 年板。
	AC.258	海欽伸伸（編），寶穀寺重刊序文於嗣德二十九年（1876）。
	AC.601	嗣德二十九年
	AC.118	翻印 AC.258 本，158 葉（31 x 21）。
	AC.354	翻印 AC.601 本，56 葉（27 x 16）。
	AC.117	顯法寺重刻
	AC.209	刻印於海陽省嘉祿縣鴻錄社
式叉摩那沙彌尼律儀	AC.465	心圓校訂，永嚴寺重刻於嗣德三十四年。
	AC.694	

因此，如果性泉在選擇帶回國的文本上，專注於弘贊的著作，那麼，性泉完全有可能將上述七種經書帶回越南。這些經書後來不斷被刊刻、印行和傳播。但如果沒有進行其他對照和求證，很難進行確認。這種嚴謹考證是必須的，因為目前在越南流通很多書籍已在「福田目錄」中被提及，或類似於弘贊著作，但它們的底本分別有不同的來源。如保大四年（1929）印本《佛本行集經》雖可見於性泉帶回的經書書目之中，但與性泉從北方請回本國的文本沒有關聯。根據書中序言，可知其重刊底本源於河內法國遠東博古學院從日本帶回的《大藏經》：「其我國從來闕焉，曾考於我皇越開闢以至於今，未得此經刻本流通。」¹²⁸因此，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可能性的假設，並不能肯定其正確性。

第三類書籍，為南同寨乾安寺（今越南河內市棟多郡南同坊）刻印的

128 不知撰著人：《佛本行集經》（河內：越南國家圖書館藏本，1929 年，編號：R.815），卷 1，葉 2 上。

經書，如表一所列。依上表分析，我們得出初步結論，如下：

乾安寺現存的一些雕版內容出現在福田所編的書目之中，可能是性泉自鼎湖山慶雲寺帶回越南。包括《解惑篇》、《西方香林禪師淨土文》與《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

弘贊著作的雕版被收藏在乾安寺，有可能為性泉帶回越南的書目，而福田卻無紀錄，如《禮佛儀式》。

從印刷的角度來看，《金剛經》與《解惑編》一起被刊刻。因此，若可肯定《解惑編》一書是由性泉帶回越南，據此，完全可以推測《金剛經》亦屬性泉從鼎湖山所帶回的經書。

需考慮乾安寺現存木板的經書（未出現在福田的書目裡）與曾經存於乾安寺的木刻板所印出來之文獻（木板現已遺失）是否曾經屬於性泉從鼎湖山所帶回的經書裡面的可能性。如《四十八願經》（包含三部不同的典籍，分別是《四十八願經》、《往生淨土懺願儀》與《往生淨土闕疑行願二門》），《大報父母恩重經》（乾安寺重刻，紹治七年〔1847〕，藏書編號：AC.308）、（乾安寺藏板、含龍寺藏板，藏書編號：TN.039-040）等經書在有其他信息對照時，需要考慮是否列入或移除在性泉帶回越南的書目。

伍、結語

越南律藏的歷史可追溯至十世紀之前，佛教在嶺南及交趾的傳播、活動。大約歷經四個世紀，律藏與《大藏經》同時在大越「進口」、重抄和重印。《四分律補抄》在十四世紀前半葉的印刷事件，以及當時的戒律傳播活動，兩者均是律藏在越南出現的重要里程碑，同時亦顯示大越佛教主要受《四分律》影響。經過屬明時期和黎初不利佛教傳播的歷史背景，自十六世紀開始，莫朝佛教在三教（儒、釋、道）關係中得到初步恢復。十七世紀黎中興時期，佛教發展逐漸興盛起來，但仍然有許多需要整頓的弊端。在國內佛教戒律經書欠缺的情況下，使得佛教僧團整頓事業需要尋求

北方經書。

性泉十八世紀初至鼎湖山慶雲寺求法、受戒、取經的過程是為了傳播及規範宗門內部。後來其他宗門也來請求抄寫、刊刻這些經書作為僧侶修習的資料，這些資料無形之中成為十八世紀越南北部戒律實踐的規範。隨著中國的嚴格戒律傳播，戒律經書消弭了當時越南僧侶惡俗、迷信等問題，使其步入正軌，並一直延續至今日。可以說，其影響及傳播已經超越了個人（性泉）、山門（如澄）和宗派（蓮宗）的局限，成為越南佛教發展歷史的大事。

此一巨大影響，主要源自性泉帶回書籍中，戒律經書的傳入和流布。性泉帶回的經書藏於乾安寺，此一有利條件，使得該地在十九世紀末以前是當時北河和大越有名的「經坊」之一。乾安寺是刻印、發行佛教經書的地方。另一方面，乾安寺還接受其他山門委託刻印經書，並提供他們底本以便刻印。與當時其他寺院相比，乾安寺具有此種特殊優勢，使得該寺成為其他山門禪師參訪的佛經資料中心，並隨著這樣的交流形式，使佛教經典得以傳播到整個北河地區。

雖然性泉沒有留下有關帶回書籍任何統計數據，但在百年後，福田收集並將他所接觸過的相關書籍編成目錄。通過一八三五年編撰的目錄，得知福田在編撰書日時所蒐羅的書籍共有一百五十二部（約有一千一百六十四卷）。其中經書數量只剩下一半，但總卷數比性泉帶回來的千卷（相傳）還多（三百部，一千卷）。通過研究現存的佛教經書，可以確定哪些是屬於性泉帶回，進而被福田寫進書目，同時亦可補充福田當時尚未檢閱到的書籍。其中有三種是性泉之後刊印的書（內容明確指出該書籍由性泉帶回越南）。有七種是弘贊的著作，弘贊是鼎湖派戒律（性泉受戒之地）最重要人物之一，因此這些經書可能也是由性泉帶回的，其中有三種在福田的書目中被提到。最後則是乾安寺現存的雕版經書，雖然不屬於戒律經書，有可能也是由性泉帶回的。

復原性泉帶回越南的經書，無論是對研究十八世紀中國漢傳佛教經典的傳播及流布，還是對於研究律藏本身都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可確定

自性泉之後，《四分律》依然是在越南普遍被使用的律經。從而體證，中國鼎湖派戒律的傳入，對十八世紀後越南佛教僧團正式展開它的影響。◆

引用書目

古代文獻

〔南朝梁〕慧皎 HUIJIAO

1924 《高僧傳》，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24 年）。

Gaoseng Zhuan, in Taishō Shinshū Daizōkyō Kankokai (eds.), *Taishō Shinshū Daizōkyō*, Vol. 50 (Tokyo: Daizōkyō Kankokai, 1924).

〔唐〕道宣 DAOXUAN

1927 《續高僧傳》，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小野玄妙（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卷（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7 年）。

Xu Gaoseng Zhuan, in Junjiro Takakusu, Kaikyoku Watanabe, Genmyo Ono (eds.), *Taishō Shinshū Daizōkyō*, Vol. 50 (Tokyo: Taishō Issaikyō Kankokai, 1927).

〔唐〕瀉山靈祐 GUISHAN Lingyou

《瀉山警策文》（河內：勝嚴寺藏本，編號：TN.080）。

Guishan Jingcewen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Thăng Nghiêm Monastery, TN.080).

〔明〕憨山德清 HANSHAN Deqing

1654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直說》（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1654 年，編號：AC.301）。

Boreboluomiduoxinjing Zhishuo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1654, AC.301).

〔明〕雲棲株宏 YUNQI Zhuhong

1832a 《往生集》（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AC.157、AC.342；乾安寺重印本，1832 年）。

Wangshengji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Kiến An Tự, 1832, AC.157, AC.342; Càn An Monastery reprinted in 1832).

1832b 《竹窻隨筆》（河內：勝嚴寺藏本，編號：TN.049；乾安寺刻印，1832 年）。

Zhuchuang Suibi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ăng Nghiêm Monastery TN.049; Càn An Monastery printed in 1832).

〔明〕元賢 YUANXIAN

1837 《淨慈要語》（河內：漢喃研究院藏兩本，寧福寺重刊於 1876 年，編號：A.2054；乾安寺重刻於 1837 年，編號：AC.316）。

Jingci Yaoyu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Ninh Phúc Monastery reprinted in 1876, A.2054; Càn An Monastery reprinted in 1837, AC. 316).

〔清〕丁易修、釋成鷺（纂） DING, Yixiu & SHI, Chengjiu (au.)

1844 《鼎湖山慶雲寺志》（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1844年，編號：AC.463）。

Dinghushan Qingyunsi Zhi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1844, AC.463).

不知撰著者 AUTHOR Unkown

《法慧塔并銘》（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No.00423）。

Pháp tuệ tháp tịnh minh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No.00423).

《佛本行集經》（河內：越南國家圖書館藏本，編號：R.815）。

Phật bản hạnh tập kinh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Vietnam, R.815).

1715 《禪苑集英》（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VHv.1267）。

Thiền uyển tập anh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1715, VHv.1267).

〔越〕陳太宗 TRẦN Thái Tông

1943 《課虛錄》（北圻：北圻佛教會，1943年）。

Khoá hư lục (Bắc Kỳ: Hội Phật giáo Bắc Kỳ, 1943).

〔越〕張漢超 TRƯƠNG Hán Siêu

《開嚴寺碑記》（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片，編號：No.23637-23638）。

Khai Nghiêm tự bi ký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No.23637-23638).

《浴翠山靈濟塔記》（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片，編號：No.30256）。

Dục Thúy sơn Linh Tế tháp ký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No.30256).

〔越〕黎崱，武尚清（點校） LÊ, Tác (au.), WU, Shangqing (proof.)

2000 《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Annan Zhilue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0).

〔越〕明行在在 MINH Hành Tại Tại

《祖師出世實錄》（北寧：佛跡山萬福寺藏本）。

Tổ sư xuất thế thực lục (Bắc Ninh: Collected in the Vạn Phúc Monastery, Phật Tích Mountain).

〔越〕吳士連等（編），吳德壽、黃文樓（編譯），潘輝黎（校訂）

NGÔ Sĩ Liên et al (eds.), NGÔ Đức Thọ, HOÀNG Văn Lôu (eds. & trans.),

PHAN Huy Lê (proof.)

2017 《大越史記全書》（河內：文學出版社，2017年）。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Hà Nội: Nxb. Văn Học, năm 2017).

〔越〕阮秉謙 NGUYỄN Bình Khiêm

《白雲庵詩集》（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A.2256）。

Bạch Vân am thi tập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A.2256).

《三教像銘碑》（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片，編號：No.4662）。

Tam giáo tượng bi minh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No.4662).

〔越〕性廣 TÍNH Quảng

《三祖實錄》（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A.2048）。

Tam tổ thực lục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A.2048).

1800 《佛說因果本行》（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AB.177）。

Phật thuyết nhân quả bản hạnh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1800, AB.177).

〔越〕范公著等撰 PHẠM Công Trứ et al (au.)

《大越史記續編》（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本，編號：A.1415；歷史院藏本，編號：HV.119）。

TĐại Việt Sử Ký Tục Biên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A.1415; Institute of History, HV.119).

〔越〕如澄麟角（喃譯） NHƯ Trùng Lân Giác (trans. to Chử Nôm)

1797 《出家沙彌國音十戒》（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景盛五年〔1797〕刻本，崇福寺藏板，編號：AB.366）。

Xuất gia sa di quốc âm thập giới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1797, AB.366).

〔越〕如月 NHƯ Nguyệt

1747 《香海禪師語錄》（河內：漢喃研究院藏，1747年，編號：VHv.2379）。

Hương Hải thiền sư ngữ lục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1747, VHv.2379).

〔越〕清莊 QINGZHUANG

《重興蓮派寺離塵院別誌》（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片，編號：No.00204）。

Trùng hưng Liên Phái tự Ly Trần viện biệt chí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No.00204).

〔越〕福田 PHÚC ĐIỀN

《四分律行事抄資持記》（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手抄本，編號：AC.682/1-20）。

Tứ phần luật hành sự sao tư trì kí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AC.682/1-20).

《繼燈錄》（河內：社會科學通訊院藏本，編號：HN.0356）。

Kế đăng lục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HN.0356).

《道教源流》（河內：漢喃研究院藏，編號：A.1825）。

Đạo giáo nguyên lưu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A.1825).

1884 《禪門修持經咒律儀》（海陽：慧光書院影印靈應寺藏本，1884年）。

Thiền môn tu trì kinh chú luật nghi (Huệ Quang Library reprinted Linh Ứng Monastery's edition in 1884).

〔越〕阮保、阮沖懿 NGUYỄN BỬU & NGUYỄN XUNG Ý

1498 《坤元至德之碑》（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片，1498年，編號：No.01919）。

Khôn nguyên chí đức chi bi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1498, No.01919).

〔越〕杜令銓 DU, Lingquan

《重修崇福寺廟庵碑記》（河內：漢喃研究院藏拓片，編號：No.00469-00475）。

Trùng tu Sùng Phúc tự miếu am bi ký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Institute of Hán-Nôm Studies, No.00469-00475).

阮朝國史館（編） QUỐC SỬ QUÁN TRIỀU NGUYỄN (eds.)

《大南實錄前編》（河內：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編號：R.773）。

Đại Nam thực lục tiền biên (Hà Nội: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Vietnam, R.773).

〔越〕潘清簡等（編） PHAN THANH GIẢN et al (eds.)

1969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年）。

Qinding Yueshi Tongjian Gangmu [*Khâm định Việt sử thông giám cương mục*] (Taipei: Guoli Zhongyang Tushuguan, 1969).

LÊ MẠNH THẮT 黎孟捷

1980 *Chân Nguyên thiền sư toàn tập* (Sài Gòn: Tu thư Vạn Hạnh xuất bản, năm 1980).

2000 *Toàn tập Minh Châu Hương Hải* (Tp. Hồ Chí Minh: Nxb. Tp. Hồ Chí Minh, năm 2000).

2005 *Toàn tập Toàn Nhật Quang Đài*, 2 tập (Tp. Hồ Chí Minh: Nxb. Tp.

Hồ Chí Minh, năm 2005).

NGUYỄN Quang Khải, THÍCH Nguyên Đạt (dịch thuật và giới thiệu)

阮光凱、釋原達（翻譯介紹）

2017 *Chuyết Chuyết tổ sư ngữ lục* (Thanh Hoá: Nxb. Thanh Hoá, năm 2017).

THÍCH Thanh Quyết, TRỊNH Khắc Mạnh (chủ biên)

釋清決、鄭克孟（主編）

2018 *Trúc Lâm Yên Tử Phật giáo tùng thư*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2018).

近人文獻

王建光 WANG, Jianguang

2008 《中國律宗通史》（江蘇：鳳凰出版社，2008年）。

Zhongguo Luzong Tongshi (Jiangsu: Feng Huang Chubanshe, 2008).

任繼愈（主編） REN, Jiyu (ed.)

2014 《中國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Zhongguo Fojiaoshi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4).

何仟年 HE, Qiannian

2003 〈越南傳入古籍略考〉，《文獻》，第2期（2003年4月），頁257-261。

“Yuenan Chuanru Guji Luekao,” *Wenxian*, No. 2 (Apr., 2003), pp. 257-261.

阮蘇蘭 NGUYỄN Tô Lan

2011 〈越南封建時代國立圖書館略考〉，阮黃燕（譯），收入王三慶、陳益源（編）：《東亞漢文學與民族文化論叢（二）》（臺北：樂學書局，2011年），頁245-264。

“Yuenan Fengjian Shidai Guoli Tushuguan Luekao,” in San-ching Wang & Yi-yuan Chen (eds.), *Dongya Hanwenxue yu Minzu Wenhua Luncong* (2), Hoang-yen Nguyễn (trans.) (Taipei: Lexue Shuju, 2011), pp. 245-264.

阮氏錦 NGUYỄN Thi Cam

2015 〈越南北傳佛教戒律的傳承與當代弘揚概述〉，《世界宗教文化》，第6期（2015年12月），頁119-123。

“Yuenan Beichuan Fojiao Jielu de Chuancheng yu Dangdai Hongyang Gaishu,” *Shijie Zongjiao Wenhua*, No. 6 (Dec., 2015), pp. 119-123.

李福標 LI, Fubiao

- 2016 〈論鼎湖山慶雲寺的戒律學傳統與地位〉，《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5期（2016年9月），頁30-35。
 “Lun Dinghushan Qingyunsu de Jieluxue Chuantong yu Diwei,” *Hun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Vol. 30, No. 5 (Sep., 2016), pp. 30-35.

李貴民 LEE, Kuei-min

- 2019 〈再製與變異：越南漢傳佛教典籍的轉化〉，第三屆「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2019年5月18-19日）。
 “Zaizhi yu Bianyi: Yuenan Hanchuan Fojiao Dianji de Zhuanhu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3rd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of Modern East Asian Buddhism (Yilan: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May 18-19, 2019).
- 2020 〈越南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初探〉，《佛光學報》，新6卷，第1期（2020年1月），頁279-320。
 “Yuenan suocang Ming Qing Fojiao Xijian Wenxian Chutan,” *Fo Guang Xuebao*, Vol. 6, No. 1 (Jan., 2020), pp. 279-320.

周齊 ZHOU, Qi

- 2005 《明代佛教與政治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Mingdai Fojiao yu Zhengzhiwenhua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2005).

周軍 ZHOU, Jun

- 2009 〈《鼎湖山志》與明清之際嶺南禪宗〉，《肇慶學院學報》，第30卷第4期（2009年7月），頁36-41。
 “Dinghushan Zhi yu Mingqing zhiji Lingnan Chanzong,” *Zhaoqing Xueyuan Xuebao*, Vol. 30, No. 4 (July, 2009), pp. 36-41.

鄭興中 ZHENG, Xingzhong

- 2017 〈弘贊在慘生平與著作述略〉，《肇慶學院學報》，第38卷第1期（2017年1月），頁47-51。
 “Hongzan Zaisan Pingsheng yu Zhuzuo Shulue,” *Zhaoqing Xueyuan Xuebao*, Vol. 38, No. 1 (Jan., 2017), pp. 47-51.

慶雲寺管理委員會 QINGYUNSI Guanli Weiyuanhui

- 2014 《鼎湖山慶雲寺歷代住持塔銘》（肇慶：慶雲寺管理委員會，2014年）。
Dinghushan Qingyunsu Lidai Zhuchi Taming (Zhaoqing: Qingyunsu Guanli Weiyuanhui, 2014).

譚志詞 TAN, Zhici

- 2006 《越南閩籍僑僧拙公和尚與十七、十八世紀中越佛教交流》

- (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
- Yuenan Minji Qiaosheng Zhugong Heshang yu Shiqi, Shiba Shiji Zhong-Yue Fojiao Jiaoliu* [*On the Min Overseas Chinese Monk Chuyet Cong and Buddhism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n the 17th, 18th century*]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2006).
- 2007 〈十七、十八世紀嶺南與越南的佛教交流〉，《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2007年9月），頁42-52。
“17, 18 Shiji Lingnan yu Yuenan de Fojiao Jiaoliu,” *Shijie Zongjiao Yanjiu*, No. 3 (Sep., 2007), pp. 42-52.
- 2008 〈17、18世紀越南佛教復興的背景及特點〉，《閩南佛學》，第6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204-221。
“17, 18 Shiji Yuenan Fojiao Fuxing de Beijing ji Tedian,” *Minnan Foxue* (Beijing: Zongjiao Wenhua Chubanshe, 2008), pp. 204-221.
- ĐINH Khắc Thuận 丁克順
- 2012 *Góp phần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triều Mạc ở Việt Nam*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2012).
- 2017 “Văn bia Phật giáo thời Lê sơ,” *Thông báo khoa học số 2 năm 2017* (Hà Nội: Bảo tàng Lịch sử Quốc gia, năm 2017), tr. 71-82.
- HỒ Bạch Thảo 胡白草
- 2013 “Thử lý giải tại sao những sử liệu thời Minh do Giáo sư Nguyễn Huệ Chi trung lên từ *Việt kiều thư* khác với *Minh thực lục*,” *Tạp chí Văn hoá Nghệ An* (ấn bản điện tử, đăng tải ngày 28 tháng 9 năm 2013).
- LÊ Kim Ngân 黎金銀
- 1969 *Lưỡng đầu chế tại Việt Nam thời Lê Trung hưng (1599-1796)* (Học viện Quốc gia Hành chính Sài Gòn, năm 1969).
- LÊ Quang Sơn 黎光山
- 2012 *Nghiên cứu bản giải âm tác phẩm “Thái căn đằm” của Hoà thượng Phúc Điền* (Luận văn Thạc sĩ,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năm 2012).
- LÊ Quốc Việt 黎國越
- 2013 “Ghi chú về thiền sư Minh Lương Mãn Giác (?-1675) đời thứ 35 phái Lâm Tế tháp Kim Cương, chùa Vĩnh Phúc, núi Côn Cương,” *Đặc san Suối nguồn*, số 8, (năm 2013), tr. 83-126.
- 2016a “Giao Châu một nẻo lối thông Tây vực: Thiền phái Trúc Lâm tiếp cận từ góc độ kinh lục,” *Đặc san Suối nguồn*, kỳ 1 (năm 2016), tr. 67-98.
- 2016b “Giao Châu một nẻo lối thông Tây vực: Thiền phái Trúc Lâm tiếp cận từ góc độ kinh lục,” *Đặc san Suối nguồn*, kỳ 2 (năm 2016), tr. 120-150.

NGUYỄN Huệ Chi 阮惠之

1981 “Cuộc kháng chiến trường kỳ chống xâm lược Minh và văn học yêu nước thế kỷ XV cùng những bước nối tiếp về sau,” Ủy ban Khoa học xã hội (chủ biên), *Văn học Việt Nam trên những chặng đường chống phong kiến Trung Quốc xâm lược*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1981), tr. 195-261.

2013 “Sách *Việt kiều thư* trong con mắt giới sử học đương đại (Nhân những bản thảo của ông Hồ Bạch Thảo cũng nhân tin sắp thành lập Viện Khổng Tử ở Việt Nam),”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và Phát triển*, số 9 (năm 2013), tr. 85-99.

NGUYỄN Tài Thư (chủ biên) 阮才書 (主編)

1991 *Lịch sử Phật giáo Việt Nam*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năm 1991).

NGUYỄN Hiền Đức 阮賢德

1995 *Lịch sử Phật giáo Đàng Trong* (Tp. Hồ Chí Minh: Nxb. Tp Hồ Chí Minh, năm 1995).

NGUYEN Cuong Tu

1997 *Zen in Medieval Vietnam: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ien Uyen Tap An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NGUYỄN Lang 阮郎

2014 *Việt Nam Phật giáo sử luận* (Hà Nội: Nxb. Văn học, năm 2014).

NGUYỄN Tuấn Cường (pháp danh: THÍCH Minh Nghiêm)

阮俊強 (法名: 釋明嚴)

2016 *Nghiên cứu tác phẩm “Đạo giáo nguyên lưu” của Hoà thượng Phúc Điền* (Luận án Tiến sĩ, Học viện Khoa học xã hội Việt Nam, năm 2016).

NGUYỄN Quang Khải 阮光凱

2016 “Công đức của một số vị thiền sư tiêu biểu đối với việc khắc ván in kinh sách ở Bắc Ninh thế kỉ XVIII- XIX,” *Nghiên cứu Phật học*, số 5 (năm 2016), tr. 51-55.

NGUYỄN Đình Hưng 阮廷興

2017 “Sơ thám kho sách Hán Nôm chùa Quán Sứ,” *Thông báo Hán Nôm học năm 2016* (Hà Nội: Nxb. Thế giới, năm 2017), tr. 281-292.

2019 “Góp thêm tư liệu về hành trạng của thiền sư Tánh Tuyền,” Tham luận phát biểu tại Hội thảo các nhà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trẻ, 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Hà Nội: 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năm 2019).

NGUYỄN Tuấn Cường, NGUYỄN Đình Hưng

2018 “Buddhist Print Culture and Knowledge Network in North Vietnam from Eigh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A Case Study of Càn An

Temple's Woodblock Collection,” The 2018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rinting Woodblocks (IAPW) Symposium: Cultural History of Printing Woodblocks in Asia – Identification and Comparison (Seoul: Seoul University, 2018).

THÍCH Minh Tâm 釋明心

1998 “Vài nét về Phúc Điền hoà thượng, tác giả sách *Đạo giáo nguyên lưu*,” *Thông báo Hán Nôm học năm 1997* (Hà Nội: Nxb. Thế giới, năm 1998), tr. 560-563.

THÍCH Minh Tín 釋明信

2008 “Tìm hiểu thêm về Sa môn An Thiên,” *Tạp chí Hán Nôm*, số 1 (năm 2008), tr. 48-55.

THÍCH Thanh Từ 釋清慈

2010 *Thiền sư Việt Nam* (Hà Nội: Nxb. Tôn giáo, năm 2010).

THÍCH Đồng Dưỡng 釋同養

2010a “Giới thiệu con người và sự nghiệp thiền sư Tỉnh Quảng,” *Tạp chí Khuông Việt*, số 9 (năm 2010), tr. 102-108.

2010b “Chùa Liên Hoa thời Hậu Lê: Thử đặt lại vấn đề chùa Liên Hoa có phải là chùa Liên Phái hay không?,” *Văn hoá Phật giáo*, số 112 (năm 2010), tr. 6-9.

2010c “Đi tìm một số bài tựa, bạt của thiền sư Chân Nguyên,” *Văn hoá Phật giáo*, số 113 (năm 2010), tr. 16-20.

2012 “Về niên đại thiền sư Tỉnh Tuyên,” *Văn hóa Phật giáo*, số 161 (năm 2012), tr. 9-11.

THECLA, Adriano di St. & DROR, Olga

2002 *A Small Treatises on the Sects among the Chinese and the Tonkinese: A Study of Religion in China and North Vietna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haca: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2002).

PHẠM Thị Thuỳ Vinh 范氏垂容

2008 “Một số đặc điểm về nội dung và hình thức của văn bia Lê sơ,” *Tạp chí Hán Nôm*, số 3 (năm 2008), tr. 38-48.

PHẠM Văn Tuấn 范文俊

2007 “*Kiến tích thành Phật*” của Chân Nguyên thiền sư: giới thiệu và khảo cứu (Luận văn Thạc sĩ, Đại học Khoa học xã hội và nhân văn [Hà Nội], năm 2007).

2012 “Một số vấn đề gắn với quê hương Chuyết Chuyết tổ sư,” *Thông báo Hán Nôm học năm 2011* (Hà Nội: Nxb. Thế giới, năm 2012), tr. 951-958.

2013 “Khảo về Chuyết Chuyết thiền sư (1509- 1644),” *Đặc san Suối nguồn*, số 3-4 (năm 2013), tr. 62-73.

PHẠM Thị Huệ, NGUYỄN Xuân Hoài 范氏惠、阮春懷

2015 *Mộc bản chùa Bồ Đà để mục tổng quan* (Hà Nội: Nxb. Văn hoá Dân tộc, năm 2015).

PHẠM Thị Chuyên 范氏專

2015 “Một số quy định đối với Phật giáo qua chính sử dưới triều Lê sơ,”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số 4 (năm 2015), tr. 34-45.

2016 “Sử liệu Phật giáo thời Lê sơ qua tư liệu bi ký,”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số 2 (năm 2016), tr. 34-62.

2018 “Một số vấn đề về Phật giáo thời Lê sơ (1428-1527) qua nghiên cứu tư liệu văn chương,”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số 7 (năm 2018), tr. 31-51.

PHẠM Lê Huy, PHẠM Văn Triệu 范黎輝、范國兆

2019 “Dấu tích kiến trúc Bát giác thời Lý tại hoàng thành Thăng Long: tư liệu và nghiên cứu,” *Tạp chí Khảo cổ học*, số 6 (năm 2019), tr. 47-71.

TRẦN Văn Giáp 陳文甲

1932 “Le bouddhisme en Annam, des origines au XIIIe siècl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32 (1932), pp. 191-268.

TRẦN Mạnh Quang 陳孟光

2011 “Ứng xử của chính quyền phong kiến Việt Nam thế kỷ XV đối với các tôn giáo, tín ngưỡng qua tìm hiểu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Nghiên cứu Tôn giáo*, số 9 (năm 2011), tr. 24-31.

TRỊNH Khắc Mạnh 鄭克孟

2017 “Di sản mộc bản chùa Vĩnh Nghiêm và chùa Bồ Đà tỉnh Bắc Giang trong đời sống văn hóa Việt Nam,” *Tạp chí Hán Nôm*, số 2 (năm 2017), tr. 21-29.

VŨ Đức Nghiệu (chủ biên) 武德僥 (主編)

2018 *Mộc bản chùa Vĩnh Nghiêm chùa Bồ Đà: Những định hướng bảo tồn và phát huy giá trị của di sản* (Hà Nội: Nxb.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năm 2018).

WHEELER, Charles J. 魏常樂

2015 “1683: an offshore perspective on Vietnamese Zen,” in Eric Tagliacozzo, Helen F. Siu, Peter C. Perdue (eds.), *Asia Inside Out: Changing Tim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35-162.

SA môn Thích Không Hạnh và Cư sỹ Chân Thanh Lê Quốc Việt

沙門釋空行和居士真清黎國越

“Truyền bản *Hương Hải thiên sư ngữ lục*- bản Sùng Khánh,”

<https://thuvienhuequang.vn/blogs/bai-viet/truyen-ban-huong-hai-thie-n-su-ngu-luc-ban-sung-khanh>, 檢索日期：2019年06月15日。